

【编者的话】

1980 年 12 月 8 日，摇滚音乐人约翰·列侬在曼哈顿达科塔大厦前被枪杀。32 年过去了，约翰·列侬在《Imagine》里唱出的对“没有国家，没有宗教，四海皆兄弟，世界合而为一的‘乌托邦’”的想象，仍然具有穿透时间的力量。在约翰·列侬逝世 32 周年之时，本期 1510 周刊与你一起想象一个乌托邦。

在台湾乐评人张铁志看来，约翰·列侬是音乐史上最巨大的摇滚明星，却也是保守体制中的危险颠覆者。他积极创作反战歌曲，与小野洋子举行“床上静坐”行动，或是走上街头高喊“人民拥有力量”，而支撑着列侬做出这一切的，是他心中对一个充满爱与和平的美好新世界的“想象”，在这个乌托邦里，没有国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贪婪、没有暴力。这并不是痴人的白日梦，因为想像力並不是没有力量的。正如张铁志所说，1980 年那声枪响虽然让列侬本人不会再威胁执政者，却并不能让人们停止想象。因为，每一代的年轻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想象属于他们的爱与和平。

约翰·列侬让我们相信，摇滚乐可以成为想象“乌托邦”的工具，有撼动现实政治的可能性，而宇宙塑料人乐队则进一步证明，一个摇滚乐团也能够翻转历史、成就一场货真价实的大革命。广播人马世芳的文章《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为我们讲述了这个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最喜欢的乐团的故事。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之下，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生活原则，抵抗被“千篇一律化”，这本身就是因为他们对心中的“乌托邦”的想象和希望。

追根溯源，“乌托邦”这个词来源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托马斯·莫尔的小说《乌托邦》。林达的文章为我们介绍了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六小时工作制，工作要服从社会需要，财产共有，没有贫富差距。物质极大的丰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林达看来，人们对乌托邦的幻想其实不断提醒着真实世界的悲惨和不完美。

乌托邦的另一面，则是“反乌托邦”。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之一，作者描绘了一个不愁吃穿、没有疾病、人人幸福的美丽新世界。但这新世界却让刘瑜感到恐惧，她认为，那里人们的幸福是“被幸福”，而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出生命的价值。科幻作家韩松认为，技术的极度发展也许并不能给人类带来完全的幸福，反而会是对人的奴役，这也是他写出“反乌托邦”科幻的思

想根源。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的文章则为我们介绍了另一位“反乌托邦”者：保加利亚诗人克里斯托·塞平斯基。他提出了乌托邦在人性上的不可能：如果说权力就是魔鬼，以获取权力为目的的革命者，愿意为了乌托邦而放弃权力，还是愿意为了权力而放弃乌托邦？

在周刊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希望跳出乌托邦/反乌托邦的二元对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为我们梳理了“乌托邦·反乌托邦”的文艺作品谱系，可以作为起点。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在接受崔卫平的访问中说：“现在你要作为‘个人’，重新和别人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和你们一样，曾经幻想伟大领袖马克思会给我一个理想，但是最后，要自己走一条路，有自己的理想。”从对一个理想世界的追求到拥有有“自主性”的、不那么空洞的乌托邦似的理想，这也是一个与世界达成和解，回归自身的过程。另一位汉学家杜赞奇则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天”成了个体与群体的自我修养和道德生活的精神资源，它能够为自我的发展提供一整套计划，而且可以在自我和超越之间提供链接，能够达到一种普世的定位，超越乌托邦/反乌托邦的二元对立。

无论是对乌托邦的想象还是恐惧，最后都要回到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之上：如何与现实世界达成和解，如何保有对更加美好世界的想象。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 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 QQ 空间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梦】

9-1 张铁志：约翰列侬：爱与和平的梦想者



“只是，1980 年那声枪响虽然让蓝侬本人不会再威胁执政者，却并不能让人们停止想象。因为，每一代的年轻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想象属于他们的爱与和平。”

And so this is Xmas

For weak and for strong

For rich and the poor ones

The world is so wrong

And so happy Xmas

For black and for white

For yellow and red ones

Let’s stop all the fight

--------Happy Xmas (War is Over)

1.

如果约翰蓝侬活到现在，他会和保罗麦卡尼、滚石乐队宛如活化石般的古老姿态在舞台上摇摆吸金吗？还是会像鲍伯迪伦、尼尔杨一样持续探索未知的音乐界限？面对

几年前的反伊拉克战运动，他会带着人们高唱“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吗？一如 1969 年他和小野洋子及伙伴们在床上静坐行动中的合唱、或者那一年五十万人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的集体高歌《给和平一个机会》。

在标举着爱与和平的六零年代中，蓝侬是这两种精神从不停歇的真正实践者。他是音乐史上最巨大的摇滚明星，却也是保守体制中的危险颠覆者。

1971 年，他到美国参加的第一场演唱会，是一场聚集了左翼青年和文化嬉皮的演唱会。那时，六零年代的华丽与苍凉刚落幕，但这些人仍试图对抗时代的退潮。蓝侬在舞台上说：“（六零年代）花之力量（flower power）没有成功，又如何？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

2.

披头四作为六零年代文化的代表、做为摇滚乐最大的偶像，是不直接介入政治的。但在 1966 年，当他们在美国的记者会被问到对越战的态度时，蓝侬说，我们不喜欢战争，战争是错误的。

说这句话需要一些勇气，因为当时在美国只有百分之十的民意反战。

然而，那一年蓝侬却穿起了军服——不过不是为了当兵，而是演出一部反战意味浓厚的电影：“我如何赢得战争”(How I Won the War)。

彼时蓝侬的和平理念是素朴的，还没有深化为坚定的政治信念。或许因为那是一种时代精神，是所有反叛的年轻人必须有的态度，所以他受到了感染。

1967 年，反战运动持续升高，金恩博士宣称“我们必须要结合民权运动与和平运动”。四月，纽约出现有史来最大的群众示威，二十五万人走在繁华的第五大道上反对战争。在纽渥克、在底特律、哈林区等地方，城市贫民区的黑人也开始骚动，和警察严重冲突。

这一年夏天也是嬉皮们的“爱之夏”(summer of love)。他们的主题曲是蓝侬唱的《你所需要的只有爱》(All You Need Is Love)，呼喊着用爱来取代暴戾。嬉皮们头上带着花，牵手唱着这首充满爱的歌，实践做爱不做战的精神

但世界并没有听蓝侬的话。

1968 年，是六零年代革命的真正高潮。在巴黎，超过九百万工人在街头几乎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无数年轻人手拿着毛语录，在天安门前高喊口号，在学校、家庭斗争 老师与父母。在布拉格，苏俄坦克开进古老而优雅的街道，镇压布拉格之春。在美国芝加哥的民主党总统提名大会，反战抗议者和他们痛骂为「法西斯主义猪」的警 察在黑夜中激烈对干。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占领学校数日，然后被警察激烈强制驱离。在蓝侬所在的英国伦敦，出现了空前庞大规模的反战游行，以暴力冲突收场。

真正血染的镜头是三月在越南马赖，美军屠杀数百个平民，大部分是老幼妇孺，穿透美国人的道德外壳。而在他们国内，代表那个时代正义防线的黑人民运动领袖金恩博士，以及甘乃迪总统之弟、正在竞选总统的劳伯甘乃迪，先后遭到暗杀。战后的美国没有比这一年更充满哀伤与震惊。

所有人都躲不掉街头和报纸上的烟硝与四溢的血迹。

纵使这一年披头四继续躲在他们的音乐世界中，并在八月发行了一首超级畅销单曲、由保罗麦卡尼所写的《嘿茱蒂》(Hey Jude)，但是在单曲 B 面，蓝侬却写下了他的第一份政治宣言：《革命》(Revolution)。

你告诉我这是一场革命

你知道

我们都想要改变世界

但是当你要谈到破坏时

你不知道你不能把我算进去（或要把我算进去）

（you can count me out/ in）

你说你要改变这个体制

你知道

我们都想改变你的大脑

你告诉我说关键的是制度

但你知道

你最好解放你的心灵

如果你是要带着毛主席的照片上街头

那么无论如何你是不会成功的

在这里，蓝侬对于激进革命的态度是暧昧的。他也想改变世界，但是他反对暴力、反对没有终极计画、只有一种自以为激进的姿态?——带着毛泽东的照片、拿着小红书就是革命吗？解放之路必须透过个人心灵的改变，而不是政治对抗。而至于他个人是否要参与，他还无法决定。

蓝侬虽然没有在 1968 年投身社会革命，却发生了一件他人生的大革命：和小野洋子(Yoko Ono)在一起。1966 年在伦敦遇到这个来自日本、在美国长大的前卫艺术家小野洋子后，他们的灵魂再也无法分开。

蓝侬的个人形象也逐渐从乖乖好男孩转为离经叛道。他不仅以已婚身份和洋子在一起，还和她一起因持有大麻被捕。他们俩甚至共同发行专辑《两个处子》(Two Virgins)，封面是两人正面全裸照片。

蓝侬的形象开始涂抹上摇滚乐最常被连结的性与药物。

3.

1969 年三月，蓝侬和洋子结婚后去阿姆斯特丹蜜月。但这不只是一场单纯的情人蜜月，而是一场和平抗议。他们在饭店里举行了一周“床上静坐”(Bed-in)行动，“以抗议世界上所有的苦难与暴力”。

这个既是一种反抗的艺术行动，也是一种有效传递讯息的方式。因为对于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媒体往往只报导现场的冲突与暴力，而忽视游行主张的理念；而他们相信 这个非暴力且新奇的行动方式加上他们的知名度，会引起世人注意，因此他们每天接受十小时的媒体采访，说明他们的和平理念。

蓝侬是深信非暴力抗争的哲学的：“争取和平只能透过和平的手段，去用支配体制的武器来向他们抗争是不适宜的，因为他们总是胜利者。他们很擅于玩一场暴力游戏，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对付幽默，一种和平的幽默”。

他们接着想要在美国进行这个“床上静坐”运动，但是尼克松政府拒绝发给蓝侬入境签证——这是后来七零年代蓝侬在美国身份争议的开始。因此他们选择去加拿大的蒙特娄，以方便美国媒体记者来。

在蒙特娄床上静坐行动的最后一晚，蓝依和房间内的支持者一起合唱了他写的新歌，现场录下来，然后七天后就发行：《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

这首歌曲充分饱含蓝依在静坐现场当下的热情与原始能量。歌词指涉了六零年代的各种符号，但是副歌却又跳脱时代的框架，成为一个可以在不同时空流动的抗议标 语。对于这首歌，蓝依说他是为了想要做一首现代的抗议歌曲来取代〈我们一定要胜利〉(We Shall Overcome) 这首经典抗议歌曲。

歌曲发行后两个月，在华府的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了一场五十万人的大规模反战游行。台上站的是老牌抗议民歌手彼得席格(Pete Seeger)，眼前是他一生见过最大的场面。他唱起了这首他其实还不熟悉的歌，但全场都能跟着他一起大合唱：

All We Are Saying：Give Peace A Chance

All We Are Saying：Give Peace A Chance

……

战争不断加温，他们也持续展开追求和平的行动。那一年圣诞节前夕，他们在纽约时代广场、东京、伦敦、巴黎等十一个城市的街头上，挂起一幅黑白的广告看版，上面写着：

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

Happy Xmas from Lennon and Yoko

(战争已经结束/如果你想要的话/蓝依和洋子祝贺圣诞快乐)

越战当然没有因为这个广告广告牌而真的结束。但是那个标语，那个在喧哗中沉静的抗议姿态，却凝结住了六零年代的理想主义。

两年后，他们把这个标语转变为一首动人的圣诞歌曲:《Happy Xmas (War is Over)》。直到今日，这首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与包容的歌曲还是在圣诞时分飘扬着。

A very Merry Xmas/一个非常快乐的圣诞

And a happy New Year/一个快乐的新年

Let's hope it's a good one/让我们希望这会是一个好年

Without any fear/没有任何恐惧

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战争结束了，如果你想要的话

War is over now/战争结束了

Happy Xmas/圣诞快乐

在 1969 年，蓝侬和洋子结合他们反战的政治主张与艺术行动，不论行动艺术（床上静坐）和装置艺术（街头广告牌）来实践他们的和平理念。蓝侬说，“我们是幽默的，我们是劳来与哈台。在这个伪装下，我们更能表达我们的主张，因为所有严肃的人如金恩博士和甘地，都会遭到枪杀。”

没有人料到的是，当他在七零年代开始用更严肃的面孔介入政治后，这句话竟然血淋淋的应验在他身上。

4.

仿佛赶着过时代的年关般，一切都要在历史的大门从“六零年代”换上“七零年代”的新招牌前，迅速收起鲜丽的羽翼。也是在 1969 年，披头四录制他们解散前的 最后一张专辑《艾比路》(Abbey Road)；滚石乐队在美国阿特蒙(Altmont)举行的演唱会造成听众死亡，为六零年代的集体狂欢写下黑色悲剧。

但是蓝侬的新旅程才正要开始。

年底，他们宣布要在加拿大举办一个「和平音乐节」，并要进行一场「国际和平投票」(International Peace Vote)，呼吁全球每个人都对战争投下一票。他们甚至组织了一个由四百个电台组成的“和平网”。

1970 年，蓝侬正式发行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塑胶小野乐队》(Plastic Ono Band)。或许是因为他在制作这张专辑时正在接受心里治疗，所以音乐是格外赤裸与诚实的自我剖析：与父母的复杂情结、他的阶级背景、生命的困惑，以及与洋子单纯而美好的爱。

在《劳动阶级英雄》(Working Class Hero)中，他面对自己的工人阶级根源。他成长的利物浦是一个典型的工人城市，而他小时家境不好，父亲是船员，母亲则遗弃他们。他在访问中说，那样的劳动阶级文化环境使他本能上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在《上帝》(God)中，他批判六零年代的假象与幻灭。他唱着，「我不相信耶稣、不相信甘乃迪、不相信猫王、不相信狄伦，更不相信披头四」。最后一句表示他要自我拆毁作为一个披头巨星的虚妄：

过去我曾是织梦者

但现在我已经重生

我曾经是海象

现在我只是约翰

终于，蓝侬拆穿所有假面，回到自我。他说，六零年代该结束的是那些色彩斑斓的迷幻，但是要继续下去的是那股理想主义。所以

亲爱的朋友

你们要继续走下去

梦已经结束了

在这个七零年代开始的门槛上，蓝侬和洋子发表公开声明说，1970 年将是新时代的元年，“因为我们相信上一个十年是旧机器崩解的时代。而面对未来，只要有大家的协助，我们就可以一起建立一个新时代”。

进入七零年代后，蓝侬将开始他更进一步的激进政治，开始遭遇国家机器的粗暴镇压，开始面临他和洋子关系的破裂与重合。虽然虚幻的梦已经结束，但是他要带着整个世代一起去“想象”（Imagine）——这是他下一张专辑名称，想象新世界的爱与和平。

5.

从 69 年底开始，越来越左倾的蓝侬开始接触当时新左派的活跃份子阿里(Tariq Ali)和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这两人至今都是英国左翼知识界的重量级人物。此时的蓝侬亟欲了解世界，并探索革命之可能性，所以希望了解这些知识份子的理念。 1971 年初，他正式接受他们采访。

在访问中，蓝侬提到他一直都很关心政治，且由于是工人家庭出身，从小就很有阶级意识。他批判美国的摇滚乐队都是中产阶级出身，所以不了解阶级体系的压迫关 系，当然他也承认披头四远离了自身的工人背景。他把自己视为新左派的一员，思考如何影响工人和学生；他的策略是当他的明星地位像特洛伊木马一样进入大众文 化体系后，便可以透过音乐以及各种访问来影响人们的意识，鼓舞他们起身改变世界。除了工人问

题外，他更强调“我们不能有一个不包括妇女解放的革命”，而女 权意识完全是洋子带给他的。

这段访问中的思考，在几天后就浓缩成一首新歌：《人民拥有力量》(Power to the People)。

写完歌之后，蓝侬马上打电话给阿里说，“那天的对谈实在让我太兴奋，所以我为运动做了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在街头一起歌唱”。他希望这首歌可以属于当代最重要的抗议歌曲，取代那些十九世纪传唱下来的老歌。

在歌词中，他用两句话写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

百万工人辛勤工作却什么也得不到

你最好给予他们真正拥有的！

他更进一步告诉左翼或者工人阶级的男性，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只是阶级，还有性别：

同志和弟兄们，我必须问你们

你们在家中是如何对待你们的太太

她必须真正成为她自己

所以她才能解放

在这一年春天街头激烈的反战抗争中，这首歌进入排行榜前十名。

这首歌更呈现出他和之前政治姿态的清楚断裂。在《革命》(Revolution）这首歌中，他对于是否要加入革命的行列还感到犹疑不定，现在他却说“我们说我们要一个革命/最好赶快开始吧！”

这首歌也展现他最乐观的期待，他相信只要人民展现力量，就能改变世界。一如他在两年前圣诞节大型广告牌上所传递的讯息：只要人们愿意用行动去反对战争，战争就

会结束。

这一年八月，蓝侬和洋子第一次携手走上街头示威，手上举着牌子写着：支持 IRA（爱尔兰革命军），反对英国帝国主义，高喊：人民拥有力量！

1971 下半年，蓝侬发表新专辑《想象》(Imagine)。在这首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歌曲中，蓝侬描绘出一个没有国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贪婪、没有暴力的乌托邦。这并不是痴人的白日梦，因为想象力并不是没有力量的：在 68 年巴黎街头的墙壁上，学生们写下「用想象力夺权」；当年新左派的知识导师、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库色(Herbert Marcuse)也说，想象就是权力——“把最前进的观念和想象力的价值转变为事实，就是革命性的！”

这张专辑和这首歌不但成为排行榜第一名，并得到左派杂志的高度称许。歌曲的音乐和意境更使其成为摇滚史上最永恒的歌曲。蓝侬证明了他可以结合摇滚乐创造力与理想主义。

有了乌托邦，有了音乐来传递这个共同的蓝图，接下来的工作是组织更多人加入他的梦。

你可以说我是做梦的人

但我不是唯一的

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加入我们

然后世界会成为大同

蓝侬准备和新左派更紧密结合。他向阿里提议他可以出钱购买一个媒体来结合更多人；他们也准备成立一个「红葡萄基金会」，来进行左翼的政治与文化工作。蓝侬透过

他们进入了真正的工人斗争，例如一起声援和金援苏格兰船厂工人的罢工。

但是，就在他要更深化他在英国的左翼政治运动时，却因为小野洋子要争取他和前夫的女儿的监护权，他们必须在短时间搬到美国。

从英国转换到美国，将对蓝侬的政治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因为他的激进政治一直深受身旁的人影响，例如小野洋子或是后来这些英国新左派知识份子。而英美的 左翼政治风格完全不同：英国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基础，且阿里和布莱克伯恩都是知识分子，但蓝侬到美国后，将进入完全不同的左翼政治实践。

6.

1971 年八月，蓝侬和洋子离开伦敦，来到纽约，住进格林威治村的小公寓。然后，地下艺术家来了，诗人来了，左派份子也来了，尤其是六零年代新左派中特立独行的人物鲁宾(Jerry Rubin)和豪夫曼(Abbie Hoffman)。这两人都参与了 1968 年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的抗争，因此和其他人一同遭到审判，被称为芝加哥七君子(Chicago Seven)。不久后，这两人成立了「国际青年党」，简称 Yippie(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他们和传统强调草根组织的左派团体不同，而是更依赖媒体政治，更强调用冲突且戏剧化的方式来攫取媒体注意力。蓝侬的床上静坐行动就是符合这种媒体造势的反抗风格，所以双方一见如故。

他们合作的第一个行动是 1971 年十二月在密西根安那堡的「释放辛克莱」(Free John Sinclair）演唱会。辛克莱是革命组织「白豹党」的重要干部，也是政治庞克乐队先驱乐队 MC5 的经纪人。他坚信摇滚乐可以推翻资本主义：「我们没有 枪，但我们有更强大的武器能够直接和百万的年轻人接触，摇滚乐就是我们最大的武器。」他在 69 年

因为贩卖大麻而被判刑十年。

在狱中，他不断要求州议会修改管制毒品的法律，期待可以藉此出狱；71 年底这场政治演唱会就是一连串运动的高潮。就在演唱会前一天，当地议会通过降低贩卖和持有大麻的刑罚；演唱会后两天，他被释放出狱。

当天演唱会是由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开场，然后有抗议民歌手欧克思(Phil Ochs)和黑人天王史提夫汪达(Steve Wonder)的演唱，以及鲁宾、霍夫曼和黑权运动组织黑豹党主席席尔(Bobby Seal)的演讲。正如鲁宾所说，「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结合流行音乐和革命政治，以推动一场全国性的革命」。

然后蓝侬上台了。他演唱的歌就叫〈辛克莱〉(John Sinclair)。在歌曲中，他唱着：“现在就让约翰自由吧!”

但是要那一个约翰自由?

是要让“约翰”辛克莱从牢狱中获得自由?还是要让“约翰”蓝侬从披头四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1971 年的约翰蓝侬，早已不再是那个看来温顺可口的偶像披头，而是一个试图接合摇滚乐与激进政治的音乐人，一个真正的行动主义者(activist)。

如果六零年代最鲜明的抗议歌手身影是狄伦，那么从七零年代的开端，蓝侬将用更多的抗议歌曲、更激进的政治姿态，来开始音乐与政治的新可能。

7.

蓝侬在美国的第二场表演是年底在纽约哈林区的阿波罗戏院，这是为了纽约阿提卡监狱的囚犯而唱。三个月前，一千多名的监狱囚犯为了争取狱中基本权益而暴动，数 十人被警察开枪伤亡。这些犯人大都是黑人，所以黑人社区在这个黑人音乐的圣地举行了一场慈善演唱会，来帮助囚犯家庭募款。许多黑人歌手如爱丽莎富兰克林 (Aretha Franklin)都出席演唱，但蓝侬这个白人歌手更直接以事件为名做出一首歌:〈阿提卡州〉（Attica State)：

“恐惧和恨蒙蔽了我们的判断

让我们从慢慢黑夜中解放出来吧”

蓝侬和洋子并不满意于这种个别的政治演唱会。“释放辛克莱”演唱会只是一个新运动的开端；蓝侬、洋子和鲁宾计画到各地巡回演唱/演说，并且组织各地的青年理 想主义者，让他们关注社区本身的问题。而是当共和党在加州圣地牙哥举行总统提名大会时，他们要到外面办演唱会抗议，以阻止共和党的尼克松连任。蓝侬甚至准 备邀请迪伦一起上路，联手重建音乐的激进政治。

然而，执政的尼克松政府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1972 年六月，蓝侬发表了来到纽约后的新专辑，名称就叫《在纽约的时光》(Some Time in New York City)。这是张高度政治化的专辑，且内容与包装都依循“头版新闻歌曲”的概念：专辑封面是模仿纽约时报头版，封面上的新闻标题则是专辑中歌曲曲目，照 片则包括洋子设计的尼克松和毛泽东一起裸体跳舞。每首歌内容几乎都是他在近期经历的各种政治事件，包括”Attica State”、”John Sinclare”、谈女性黑豹党员的”Angela”、关于 1972 年北爱民权运动者被英军枪杀的 “Sunday Bloody Sunday”



等、记录他们纽约生活的 “New York City”，以及一首引起诸多争议的女性主义歌曲”Woman is the Nigger of the World”。

这种新闻式歌曲早已是美国抗议歌曲的传统（注六），但这张专辑的评价和销售都不好。或许，这些歌曲的价值真的和新闻一样，只有记录历史时刻的意义，却无法传世。当然，如何写出音乐美学上可以永恒，但又饱满抗议精神的歌曲，是所有抗议歌曲的难题。

8.

即使这张专辑评价不佳，但蓝侬透过文化造成的政治影响力却已经强大到可以颠覆政权了——起码当政者是如此认为。FBI 早就开始监控蓝侬，甚至用各种手段打击 他，包括对报纸放消息说他资助恐怖主义，或者说鲁宾被 CIA 收买。72 年五月，蓝侬在 FBI 的档案从「新左派」提升到「革命活动」。

真正对蓝侬造成打击的，是 1972 年初，一名参议员写了一封秘密信给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长，指控蓝侬和左派份子“正提出一个计画要逼尼克松下台。”他们计画在 各个举办初选的州举办演唱会，以进入校园、推动大麻合法化、鼓励青年去抗议共和党提名大会。……如果可以终止蓝侬的美国签证，会是一个好的反制策略。」尼 克森政府开始了准备驱逐蓝侬出境的程序。

共和党之所以这么担忧蓝侬的影响力，关键原因之一是 1972 年这次大选是美国第一次把投票年龄降到十八岁，所以年轻人的选票将扮演重要角色。而属于年轻人的摇滚乐，或许就是辛可莱相信的最有力的政治武器。

无论如何，约翰蓝侬成为摇滚史上第一个因为政治影响力而被美国政府试图遣送出



境的音乐人。此后数年，蓝依展开了和美国政府漫长的法律诉讼，并深深影响了他的 音乐革命计画。在律师建议下，为了保持低调，他们取消了原来反战巡回演唱会的计画。而美国在 73 年开始从越南撤兵、尼克松爆发水门案并于次年辞职下台，也 使得抗争顿时失去了方向感。蓝依逐渐淡化他的政治参与。

一个深具象征性的改变，是 73 年春天，蓝依和洋子离开他们在格林威治村的革命小窝，而搬进中央公园旁边的豪宅达科塔大楼(Dakota)。

年底，他发行新专辑《心灵游戏》(Mind Games)，音乐的政治意味大大降低。69 年时，他曾说希望人家记得他是和平主义者的身份先于音乐人，但现在他却说“〈你所需要的只有爱〉(All you need is love)就是我最终的政治信仰。我发现涉入政治太多会影响我的音乐。我是艺术家，不是政治人物。”

1976 年中，蓝依终于赢得诉讼，获得永久居留权，但他却也早已疲惫不堪了。

1980 年十二月八日，他在接受媒体的访问中说：“也许在六零年代时，我们都像小孩般的天真，然后各自走回自己的房间。我们终究没有得到一个花与和平的美好世界……但六零年代确实告诉了我们该具有的责任与可能性。它不是最终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可以一瞥事物的可能性。”

这是什么样的可能性呢？或者我们该如何去「想象」新的爱与和平的可能性呢？蓝依没有机会告诉我们，因为那是他人生最后一场访问。

六个小时后，他就在曼哈顿家中的门口被枪杀了。

9.

我站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莓园」——这里并没有草莓，只是在地上刻了「Imagine」字样的图案。每年冬日他的祭日，都会有无数歌迷在这里聚会，点起蜡烛，唱着蓝依或披头四的歌。

几十公尺外公园旁的大楼，达科塔大楼，就是蓝依被疯狂歌迷枪杀的地点。

没有人想到，六零年代的精神会以如此暴力而黑暗的方式终结。

然而，蓝依证明了摇滚乐如何可以撼动现实政治——至少当权者是如此相信，所以才试图要驱逐他出境。到了八零年代时，FBI 仍然不愿意解密关于蓝依的历史档案，因为他们说资料一旦公开，将会在英国造成“政治和经济不稳定，以及社会暴动”。

只是，1980 年那声枪响虽然让蓝依本人不会再威胁执政者，却并不能让人们停止想象。因为，每一代的年轻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想象属于他们的爱与和平。

当人们在圣诞夜聆听动人的《Happy Xmas (War is Over)》时，他们会被唤起对和平的温柔渴望；而当人们唱着《Power to the People》时，下一场抗争或许就在不远处。

蓝依死了，那个六零年代试图追求爱与和平、试图反对战争机器、相信把权力还给人民的象征死了。但那又如何？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

（本文选自《时代的噪音：从狄伦到 U2 的抗议之声》）

（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原文链接：http://soundfury.blog.163.com/blog/static/168626598201097111459772/） 【返回目录】



9-2 马世芳：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这些青年根本没有政治历史，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只不过是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创作自己喜爱的音乐，唱自己想唱的歌，不与自己过不去。”



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的乐团——“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毕竟在那些观光客的例行活动之外，我还是偷时间跑去唱片行，买了好几张他们的专辑。店员听说我要买“宇宙塑料人”的唱片，还露出“阁下十分识货”的赞许表情哩，害我虚荣了好几天。

据说他们前前后后出了十来张唱片，我只买到五张，其中两张还是九〇年代捷克剧变之后的重组演唱会实况。CD 附的说明小册是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捷克文，我只能望纸兴叹。不过我还是在其中一篇评述文章的末段，辨认出作者署名：瓦茨拉夫•哈维尔（Vάclav Havel），剧作家，捷克共和国总统。

反复听着手上这几张专辑，从七〇年代初期偷偷录下的地下演唱会实况，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重组演唱会，这几个造型怪异的长发老嬉皮，玩的音乐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宇宙塑料人”的音乐有一种弥天盖地的感染力，有时小提琴和笛子跟压迫力十足的低音贝司一起出现，配着阴沉的鼓击和往复循环的电吉他音节，构成即沉重又优雅的强大

张力。有时整首歌都是漫乱倾侧的不规则音符，配上长长的念白，抑扬顿挫，像一帧康定斯基的抽象画。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的音乐非常压抑，有些自恋，有些骄傲，但总是挥洒自如、才情洋溢。那样的音符罗列，埋藏着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绝不是英美摇滚乐团做得出来的。当然，他们的歌词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那好像也不大要紧。无论如何，我已经变成他们的歌迷了。

会知道这个乐团，中间颇有一些波折。记得最早看到这个团名，是报上一篇关于一九九〇年哈维尔的专访。这篇文章激起了我莫大的好奇——当然，捷克刚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在前一年，剧作家哈维尔领导的“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令捷共丧失政权，半年前还在吃牢饭的哈维尔，众望所归地出任共和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上慷慨陈词：“人民，你们的政府归还给你们了！”但是老实说，那时候的我对东欧情势一无所悉，也弄不清楚哈维尔原来是做什么的。真正激发我兴趣的，是在那篇文章里负责访问哈维尔的家伙——来自纽约的摇滚歌手娄•里德（Lou Reed）。

你当然知道娄•里德，知道他在六〇年代的乐团“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还有那张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设计封面、画了一只大香蕉的名作。关于“地下丝绒”，最著名的描述就是：“没几个人买他们的唱片，但每个买了的人，后来都组了自己的摇滚乐团。”娄爱男人也爱女人，娄是只大毒虫，娄对性虐待的种种仪式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娄把自己充满奇特情节的私密生活谱成歌，用一种神经质的、自恋至极的、半吟半念的方式哼唱，好听得叫人想咬他一口。然而，共和国总统为什么会跟这种家伙混在一起呢？

后来我才知道，哈维尔是全球头号“地下丝绒”歌迷，不仅如此，他还是怪老子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的歌迷！哈维尔刚刚当上总统，就迫不及待地把扎帕请到捷克，以上宾之礼相待，还有意请他担任文化使节。毕生都在边缘奋斗的扎帕大受感动，

差点就入了捷克籍。此外，哈维尔还邀请到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为国宴表演——我想，地球表面不可能有对摇滚乐更友善的国家元首了。

哈维尔是在一九七六年，他四十岁的时候迷上摇滚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有个朋友拎着酒跑来敲他的门，跟他彻夜长聊，并且还提议他跟一个名叫伊凡•希罗斯（Ivan Jirous）的年轻人见见面。他跟哈维尔说，希罗斯别名“马哥”（Magor）——这个字在捷文的意思是“疯汉”。马哥不但是“宇宙塑料人”这个乐团的“艺术总监”，还有一群满怀激情的波希米亚浪子，把马哥当成精神领袖，他们替这个次文化社群取名为“地下社会”。雪夜来客说：他们真精彩，你真该认识一下这群小伙子。

关于马哥这号传奇人物，有位记者是这么说的：“马哥经历过嗑药、酗酒、摇滚、吃牢饭、被条子痛揍、样板审判、重刑监狱、神话传奇、一场大革命，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诗。”经过引荐，哈维尔抱着“姑妄听之”的心情，和他在布拉格相会。马哥是个长发披肩、形容邋遢的汉子，一面滔滔不绝发表他对捷克音乐复兴的看法，一面拿出两三卷卡带，塞进录音机，放给中年剧作家听，那是几个当地摇滚乐团，包括“宇宙塑料人”的表演实况。哈维尔听着破录音机里的音乐，大受震动，于是推掉了其他约会，跟马哥跑去酒吧，彻夜聊到天明，从此成为忘年至交。

哈维尔在多年后回忆那天的感觉：“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从这天开始，哈维尔变成了“宇宙塑料人”的忠实歌迷。后来，这些年轻人又介绍他听地下丝绒和弗兰克•扎帕的音乐。它们从一张张刮花了的旧唱片，转拷成一卷卷秘

密流传的卡带——在那个年头，一旦被秘密警察发现你在听美国摇滚乐，可是会被抓去关的。后来，就跟千千万万捷克青年一样，不知不觉，哈维尔已经把摇滚乐视为和文学一样重要的生命元素了。

在肃杀、灰暗的七〇年代，许多捷克政治犯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在牢房里。面对无穷无尽的审讯与折磨，他们重获平静的方法，往往不是祈祷，而是轻轻哼唱娄•里德的歌、背诵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的诗句。弗兰克•扎帕和“地下丝绒”的唱片，在美国从来就不是畅销品，然而扎帕怪异突梯、充满荒谬色彩的音乐，和“地下丝绒”描述种种陷溺堕落景象的作品，对捷克青年来说，毋宁是更贴近生活实况的。

在一九六八年苏军坦克大举压境之前，布拉格生气蓬勃的文化圈，经常被拿来跟六〇年代的“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和纽约东村相提并论：大家写诗、蓄长发、搞现代艺术、弹吉他、嗑药、穿五颜六色的衣服，觉得生活理应就是这样。也不知该说幸或不幸，“宇宙塑料人”的成立，正巧在“布拉格之春”被十八万大军剿灭之后一个月，碰上了当权者用尽全力要铲除那种花花绿绿的生活，让一切回归“正常化”的起点。一九七一年，官报公然宣示：“政府不会容许‘百花齐放’，我们所要栽培、要灌溉、要保护的，只能是那唯一的花朵——马克思主义的红蔷薇！”“宇宙塑料人”的披肩长发、奇装异服、放荡行径和高分贝的摇滚乐，简直摆明了跟国家机器过不去，注定了他们被整肃的命运。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猜想，“宇宙塑料人”应该是个政治意识十分强烈的乐团吧。但肉店学徒出身的团长米兰•贺拉夫萨（Milan Hlavsa）回忆说：才不是哩，他只是忍不住想玩摇滚而已。“宇宙塑料人”的歌词完全不提政治，甚至连抱怨与哀叹的情绪都不多见。他们是这样相信的：“对这个荒谬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地忽视它。”他们用不和谐的高分贝噪音、粗鄙的打油诗、油腻的长发、惊世骇俗的打扮和浪荡的生

活方式，直接把官方标举的那套“好公民的价值”扔进了茅坑。一位捷克文化人这样描述“宇宙塑料人”的行径：“他们不跟当政者对话，只跟自己人对话；他们没有变成异议分子，反而创造出一种可以暂时满足自己的另类文化；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

不消说，这替他们惹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在七〇年代初“正常化”运动雷厉风行之下，无论搞摇滚的小伙子多么不愿意和政治扯上关系，都不可能幸免。所有乐团都必须重新接受“资格审查”，领有执照才能表演。团名或歌词不能出现英文、不能蓄长发、不能穿奇装异服、不能写晦暗悲观的歌词、不能有挑逗夸张的舞台动作、不能把音量开得太大声……最糟糕的是，万一没领到执照，先不说你根本没有场地可以表演、拿不到演出酬劳，连舞台音控器材都会被警察没收，因为那是国有财产。

以上各项标准，“宇宙塑料人”无一符合。然而他们不愿意改团名，更不想剪头发。他们自己用报废的收音机拼装出堪用的音响器材，一面做工赚钱，一面想尽办法登台演出。一场典型的七〇年代“宇宙塑料人”演唱会通常是这样展开：表演开始前两三天，耳语悄悄在熟人之间传开——据说“宇宙塑料人”要表演，地点可能是一个城郊谷仓，也可能是某人的结婚典礼，或者是一片林间空地。确切的时间地点，要到演出当天傍晚才公布。一旦地点确定，便会有几十个人，千里迢迢坐火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然后长途跋涉，穿越森林、踏过雪地、顶着风雨，来到一座波希米亚农庄。众人摸黑踏进约定的那个谷仓，运气好的话，“宇宙塑料人”会在里面，准备办一场秘密演唱会。

然而，消息灵通的秘密警察往往会循迹而至，打断演出，让所有心血通通泡汤。

这类故事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一九七四年的“布多维茨‘大屠杀’”：这年三月，一千多个年轻人费尽千辛万苦跑到小镇布多维茨（Budjovice），准备看“宇宙塑料人”的表演，没想到警察早就等在当场。这些年轻人被押进黑漆麻乌的隧道里，惨遭警棍痛殴，然后整批送上火车，开回布拉格。几百名青年录了口供、六人被正式逮捕、几十个学生被退学——整个事件之中，“宇宙塑料人”根本还没开口唱歌呢。

回头说马哥。一九七六年，就在马哥跟哈维尔相识之后不久，他决定结婚，而且要大宴宾客。不用说，婚宴变成了一场“宇宙塑料人”和所有捷克地下乐团的马拉松演唱会。就在“地下社会”的亲朋好友共聚一堂、狂欢正酣的时候，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所有参加演唱会的人都被抓去录口供，二十二个人被拘捕，大批录音带、歌曲手稿和乐队自制的控音器材都被没收。

“宇宙塑料人”的团员在一场样板审判中，被形容成吸毒酗酒性乱交打架滋事的地痞流氓，他们是“堕落的象征、社会的毒瘤”。国家机器动员大批人马抹黑这几个年轻人，让一般大众相信这只不过是单纯的刑事案件。最后，马哥和“宇宙塑料人”团员被判处八到十八个月不等的徒刑，“捷克青年永远不会在这种音乐之下起舞！”判决书上张牙舞爪地吼道。

哈维尔大为愤怒，决定展开救援“宇宙塑料人”的行动。他认为，假如大家都认同当局的说法，觉得这些年轻人罪有应得，那么这个社会可以算是完蛋了。“这些青年根本没有政治历史，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只不过是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创作自己喜爱的音乐，唱自己想唱的歌，不与自己过不去，”他义愤填膺地说，“政权可以把所有独立思考、独立表达意见的人（即使只是私下思考和表达意见）都关起来……权力不知不觉暴露出它的真正意图：要让生活变得千篇一律，凡出现稍有不同的、个人的、突出的、独立的，甚至于不能归类的事物，都要用手术刀切除移走”。

没有人想象得到，这个救援事件竟成为捷克历史的转折点。尽量用简单的说法浓缩这段故事吧：哈维尔发起的联署抗议活动，竟发展成捷克知识分子在一九六八年之后的首次大串联。这群人觉得民意可用，决定一鼓作气，集体起草了“七七宪章宣言”，正式和当政者杠上了。哈维尔身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自此屡遭迫害，数度进出牢房，成为东欧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他在一九八九年最后一次出狱后不久组成“公民论坛”，在“丝绒革命”中促成了捷克当局的下台。

后来，就像全世界都知道的，哈维尔当选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成为地球上最喜欢摇滚乐的国家领导人。

而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忍不住想玩摇滚乐的肉店学徒开始的。你能想象吗？当然，说是“宇宙塑料人”推翻了捷共政权，未免也太夸张——他们真的只是几个忍不住要玩摇滚乐的小伙子罢了。然而，你可知道他们为了实践“搞摇滚”这个简单到近乎可笑的愿望，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出狱之后的“宇宙塑料人”，被官方剥夺了所有公开表演的权利，然而他们不改其志，仍旧钻尽漏洞寻找机会。马哥想出一个极具创意、又不触犯法律的表演方式：他先开一班讲解“现代艺术”的课程，放几张安迪•沃霍尔作品的幻灯片，然后请“宇宙塑料人”出场，表演整整一小时的“地下丝绒”音乐。偶尔会有朋友提供场地让他们表演，这些地方却经常在几天之后被一把无名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宇宙塑料人”的成员后来又数度被捕，萨克斯手伍拉提斯拉夫•布拉碧涅（Vratislav Brabenec）下狱的新闻被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害捷共政权变成国际笑柄，颜面尽失。到了七〇年代末期，警察只要在街上看到他，就是一顿痛殴，实在没办法忍受这种迫害的他于一九八二年逃到加拿大去了。对“宇宙塑料人”的乐迷来说，布拉碧涅的出走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至于偷偷摸摸参加演唱会的歌迷，也长期处在类似的恐惧中。假设你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星期五晚上跑去酒吧看了一场演唱会，到了星期天，那家酒吧忽然失火，烧得精光；星期一清早，秘密警察跑来敲门，把你带去问话，其中一个对你的肚子狠狠揍了两拳，另外一个则以你的学业和工作相胁，你已经在当局留下了案底。请试着想象一下：下次再听说“宇宙塑料人”的演出讯息，你还会不会去听？朋友偷偷把一卷《白光/白热》（White Light/White Heat）专辑转录的卡带，或者一本听写传抄的约翰•列侬歌词集交到你手上，你会不会紧张得心跳停止？

实在很难想象当局何苦动用这么极端的手段对付这些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他们真的相信这种音乐会毁掉整个政权吗？或许这是一个循环的问题：正因当局相信这种音乐必须被摧毁，摇滚乐反倒成为某种心照不宣的认同符号。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凡是政府讨厌的东西，就是好东西。”于是摇滚乐禁忌的魅力与日俱增，它在当局眼中的危险性也就愈升愈高。最后，很讽刺地，政权真的垮了，而且真的肇因于一个被迫害的摇滚乐团。

“变成‘异议分子’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贺拉夫萨在多年后回忆说，“我们只是觉得，应该替自己的生活做主而已。”然而这几个形容猥琐的摇滚浪子，确确实实改变了捷克当代的历史，也成为摇滚乐诞生近半世纪以来，最让人心醉神驰的传奇之一。你当然知道，摇滚乐的历史中，“传奇”这两个字早就被滥用到了极点。然而，“宇宙塑料人”是当之无愧的——放眼望去，世界上还有哪一个乐团，能够翻转历史、成就一场货真价实的大革命？

最后让我引一段娄•里德的歌词吧。一九九〇年访问哈维尔的时候，娄送给总统的那张新专辑里，正巧有这首歌，简直就是“宇宙塑料人”传奇的写照：



你不能指望家人

你不能指望朋友

你不能指望聪明才智

你不能指望上帝

你不能指望智者

因为智者不存在

你不能指望好心人

好心人专做灯罩和肥皂

很多事情都不能指望

最糟的事情老在发生

你得要有满满一公车的执念

才能让自己过下去……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宇宙塑料人”的故事。（一九九八）

本文选自（选自《地下乡愁蓝调》）

（马世芳:台湾作家、广播人，著有散文辑《地下乡愁蓝调》、《昨日书》。）

【返回目录】

9-3 林达：托马斯•莫尔和《乌托邦》

“乌托邦在十六世纪中叶就已经迷住了欧洲。它的虚拟虚构，也成了‘不可能存在之好地方’的代名词。可是，不论人们怎样知道其虚幻，它虚拟的美好一面，还是在不断提醒真实世界的悲惨和不完美。”

“乌托邦”这个概念源自一本同名书，作者就是英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托马斯·莫尔。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 A Man for All Seasons（中文译作《良相佐国》，也有译作《日月精忠》的），在第三十九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得八项提名，获奖六项，包括最佳影片 和最佳导演。我很喜欢这电影，因为拍得考究。可电影对莫尔的著作不感兴趣，只是在电影开始不久的一场闲聊戏中提了一句，暗示莫尔是《乌托邦》的作者。不熟 悉这段历史的观众，很容易就忽略了这点暗示，并不因此就明白托马斯·莫尔就是“乌托邦”的始作俑者。我忍不住要讲讲他的故事。他自己、他的时代，实在太戏剧化了。

与其说托马斯·莫尔的人生戏剧化，还不如说是被“亨利八世时代”给“造就”的。那还是十六世纪。亨利八世他爹是亨利七世，八世的王位本不是他的，而是应该传给他哥亚瑟。

我特别留意亨利八世的故事，一个原因是以前读到过他的王后凯瑟琳的故事。我在《西班牙旅行笔记》里讲过古西班牙建国的故事：那是两个最大王国联姻的结果，就是阿拉贡的费尔南多王子和卡斯蒂里亚十九岁的王室女孩伊莎贝拉的结合。他们婚后各自继承王位，两大王国因此合并，就是西班牙的主体。王室政治 联姻在古代很普遍，可是，联出如此皆大欢喜的结果，并不常见。他们后来有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就是凯瑟琳。



那个时代的王子公主，几乎不可能有幸福生活。凯瑟琳就命中注定不幸。她先嫁了英国王储亚瑟，当然是长辈为了维系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关系。可是，1502 年，亚瑟还没继承王位，就突然去世了。

英国和西班牙急了，急的是联姻背后的政治联盟怎么办？紧锣密鼓策划下来，就要求凯瑟琳接下来再嫁，和亚瑟的弟弟订婚，说是订婚而不是马上结婚， 是因为这个弟弟那年才十二岁，他就是后来的亨利八世。 这双方都是天主教，而转嫁计划不合《圣经》，天主教廷绝不会同意。于是，双方家长就想出一招，让凯瑟琳出来宣称，自己嫁亚瑟后并没有圆房。这样，教皇认可，发个训令，认定前面无“实质婚姻”，新娘子还是处女，就可以改嫁了。正式成婚是亚瑟死去七年后的 1509 年。那年亨利七世去世，亨利八世即位。

此刻，亨利八世十八岁，凯瑟琳已经二十四岁。且不提英国后来对西班牙联盟失去兴趣，少年亨利更是对这个安排早有抗拒，不过，这对夫妇还是成婚，并生下了几个孩子。

可是，问题来了：只活下一个女孩。而亨利八世坚持说，自己不要传女王，他要生个国王。到了凯瑟琳四十岁，他对凯瑟琳能否生出个国王完全绝望。再 说，亨利八世已经有了数个情人，其中还有一对是姐妹。最终是那个妹妹安妮·波琳使得亨利八世入迷，决意废后另娶。不过，天主教廷一关，又一次冒出来，他需 要教廷的离婚许可。当然，要理由显然难不倒亨利八世，理由还是原来那个理由，只是这次反过来说：宣称凯瑟琳和他的哥哥亚瑟当初其实是圆了房的，亨利八世这 婚姻原本就应该算作无效。

可是你想，这教皇要是马上就跟着亨利八世改口，再发出相反的新训令，还有什么

权威？再说了，政治婚姻的解体也是政治，牵涉一系列欧洲国家的复杂利益，教皇还有“政治难处”，于是，干脆顶着不批。

亨利八世哪里肯委屈自己。当然，国王有特权，他尽可把王后打入冷宫，自己寻欢作乐，事情也一直如此。所以，很多历史学家说，这并非事关浪漫与爱 情，而是事关男性继承人。但仔细阅读历史，你会发现也不能这么说，不要说亨利八世写给安妮·波琳的情书今天还留在梵蒂冈图书馆，激情溢出纸外，而且，他实 际上已经和别人有过一个封了爵位的私生男孩，只是那个男孩的母亲已经失宠，亨利八世不要她当王后了。

让今天的人难以相信的是，为了这场离婚风波，惊动几多欧洲国家，台上私下，政治交易、金钱贿赂不知有多少。其间还有不少花絮，一是 1529 年， 有过一次“教皇代表庭”审理，执迷不悟的王后还痴痴地问，我到底哪里还做得不好？亨利八世的回答很经典：什么都好，婚姻也美满，我这是“为了国家”。后来审判拖延，不了了之。二是在这次审理一年之后，不知哪个出的主意，居然求助于“欧洲名校投票”。结果意大利的大学依教派投票，意见两分；巴黎大学在法国国王压力下支持了亨利八世，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本来就捏在亨利八世手心里，当然也对他投了支持票，但是，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可见真是各种方法都试过，黔驴技穷了。

安妮·波琳已经怀孕，亨利八世也尽了一切努力，最后他决定，还是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英国，运用自己的政治手腕解决。他疏通种种必要关节，顺我者 昌，逆我者亡，凡反对者就以叛国罪处死，终于威逼英国国会议员们纷纷屈服，通过一系列法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1534 年 11 月 11 日通过的《王权至上 法》，令历史倒退一大步。先是更名原来天主教的“英国教会”为“英国国教会”，即英国教会从此脱离天主教廷，这也就是英国国教的来历。

说它令历史倒退，当然不是指英国脱离天主教，而是你一看这个法案名称就知道，法案恢复了“王权至上”：确立国王对国家、对教会，都拥有绝对主 权。此后，不论是口头还是文字，只要是反对国王，都可以依这个《王权至上法》，以“叛国罪”论处。谁都知道，不仅是死罪，还有种种难以置信的酷刑，细节我 在这里还是免了吧。所以，国会不仅立法自废武功，还顺带废了罗马教廷和本国教会约束国王的功力。

顺便说，英国国教的产生，虽然是借了新教改革运动的东风，但是，它和其他因宗教改革而产生的新教很不同。虽然作了一些仪式简化，但并没有什么理念上的重大革新：和天主教决裂本不是理念争执，而是，说来可笑，只是亨利八世要再婚。

所以，对亨利八世最重要的，是国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王后废旧立新，总算如愿以偿。这一条比较特别的是，不仅不能有反对声音，还全国上上下下都要过关宣誓赞同，而且非黑即白，不宣誓“赞同”就等同“反对”，有点“留发不留头”的架势了。由于事关脱离教廷，最难轻易压服的倒是普通僧侣和修女， 因为他们是信仰最为执著也最忠于罗马教廷的一批人。于是，“叛国罪”满天飞，酷刑死刑不断。一番鸡飞狗跳之后，总算摆平了。

就在这场王室婚姻引发的宗教政治风暴中，事情已经发展到远远超越起因的王室家庭是非，而是整个国家状态变得极不正常，很自然就把整个上层划为三 块，中间一大批是屈服的，为保住脑袋只能如此，而剩余的人走向了两极。一是出了一批为亨利出谋划策、罗织罪名、残害一切反对者的小人，还有就是在高层屈指 可数，直面死亡威胁，还是敢于坚持己见不惜掉脑袋的人。在那个黑暗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八十岁的费希尔主教和写过《乌托邦》的托马斯·莫尔了。

费希尔主教是英国教会高层难得慨然赴死的一个。而托马斯·莫尔更是不同，他是

学者和政治家。按说他的死并不是在殉教。但是在政教合一年代，偏偏就是掰扯不开的事情。所以，在四百年后，梵蒂冈教廷给他们两个一起封了“圣人”。

影片选择了托马斯·莫尔和亨利八世冲突，直到被斩首的人生高潮一段。其实他的一生非常丰富，年轻时在牛津大学沉湎于文学，学法律之后开过律师事务所，据说他专注事业学问，又很会生活，家里布置得舒适艺术，花园美丽，家庭和睦，高高兴兴生养着一群孩子。他虔诚于宗教，又和以人文主义闻名的伊拉斯谟 是最好的朋友。1504 年，托马斯·莫尔成为国会议员，期间秉公直言，因此还得罪了亨利八世他爹亨利七世。1515 年，莫尔成为议长。他当过代理行政官， 打破了当时盛行的受贿风气。1529 年还曾出任英国大法官。他廉洁奉公，不论人品能力，都口碑极佳，是亨利八世亲自选他进入枢密院。在 1532 年，也就是 国会向国王彻底低头屈服的两年前，莫尔发现自己已经不可能力挽狂澜，便选择洁身自好，弃官辞职回家，过平民日子。

即便如此，因为莫尔拒绝宣誓支持亨利八世，还是没有被放过。在国王身边的小人奸臣操作下，他还是被关进死囚牢。他只要松口，表示支持亨利八世的所有作为，就可以回家，要当官还可以当官，可莫尔仍然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最终以叛国罪被处死。

1535 年 7 月 6 日，莫尔平静赴死。行刑前，他强调了自己对国家和国王的忠诚，这是他的原则，他认为自己反对的是“事”。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这颗头颅被砍得冤，它没有叛国。”对此，亨利八世毫不领情，托马斯·莫尔被砍下的头颅，还是被挂上伦敦桥示众。

在电影里，托马斯·莫尔是个典型的守古典原则的政治家，又是个严谨的大法官，重思辨，博学，雄辩，逻辑严密，智慧而隐含幽默，信仰体现在行为有准则，不仅不越线行事，而且是宁死不越线，给人感觉是：其宗教信仰和理性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融合。

哪怕是拍得很考究的传记片，也还是艺术，不能全部替代历史。影片描述的托马斯·莫尔，基调或许并不错，只是，那个年代的“伟人”也无可避免可悲 地落在历史局限之中。影片当然希望突显托马斯·莫尔对个人价值的坚守，强调在亨利八世时代的整体黑暗沦落时，他给出了一点人性坚守的希望来，所以就不想 “牵扯过多”。实际上，却像我以前提到的“光荣革命不光荣”一样，托马斯·莫尔的从政生涯，也不是一个完美故事。

教会只是崇拜神的人之聚合，教士乃至教皇，都不是神。他们很可能会按照自己狂妄的揣测，自以为是地以神的名义行事，常常铸成大错。托马斯·莫尔 虽然并不在教会任职，但在政教合一时代，作为大法官他也必然涉及宗教审判事务，如审判异教徒，并依照当时法律，判处异教徒死刑，这不但是他不可推卸的职 责，也符合他的信念。托马斯·莫尔不可能逃脱那个时代的命运安排，越是以真诚信念去履行职务，越可能做出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错的事情。

然而，围绕亨利八世因离婚案件走向王权至上的过程中，政、教上层纷纷趋炎附势放弃坚守，甚至违背良心大行迫害、滥杀无辜的时候，他逆水而行，慨然赴死，也是同样的信念所致。这些表现，足以令后人相信他做过的错事并非违背良心，而只是历史局限使然。他不惜以生命抵制亨利八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 是他认为国王与天主教廷及教士为敌，已经是异教徒的行为。而“忠诚”的价值观又令他不会行叛乱之事，而只能以辞职抵制、以沉默抗议，不惜赴死，是他认为必 须做的事情。而我们，当然只能历史地去看待历史人物。

传记片是 1966 年拍的，我也在想，为什么挑了他？古典政治其实是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家个人品质的要求；一是政治坚守的核心价值本身。这是个 古老传统。而现

代政治变迁，西方国家已经很少坚持寻求政治家的个人完美；当世界进入现代，面对越来越大的冲突、危险和变数，对信念坚守的颂扬，也越来越多 地伴随着复杂环境中衡量妥协的描述，这在国际政治中尤其突出。也许，政治家如何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成为一个越来越困难复杂的话题。人们会感觉，他们需要 回头去看一看来路，提醒自己：有时你不得不偏离路径，有时你不由自主地偏离路径，可是，真正的危险是彻底迷失。也许，这是英国人、是西方文化在提醒一个隐 身于现代政治身后、坚守价值的古典传统，虽然，价值观本身也在变化中。

掌控了教会之后，亨利八世得以随心所欲，废去凯瑟琳，他又娶过五位王后。让人错愕的是，他还砍了两个王后的脑袋，相比之下，凯瑟琳还算幸运，虽 然郁郁寡欢，倒还是寿终正寝。而被砍头的其中一个就是安妮·波琳。当激情退潮，亨利八世再次需要摆脱这个新王后。当他可以自行其是，从他采用的方式，可以 想见王权强大的程度，为编造“不忠”罪名，他竟然还多砍了五个大臣的脑袋：要印证王后“不忠”，总要找到“偷情对象”。而取伪证和诬陷定罪的任务，也是亨 利八世派给枢密院大法官的任务。这也令人回想起托马斯·莫尔当年不肯做违心之事，坚决从枢密院辞职隐退的选择起因。

电影给观众带来的另一个误读，就是认定亨利八世就是电影屏幕上那个傻大黑粗的愚昧君王。其实，完全不是。在他即位之后的最初年代里，英国学者曾 一度欢欣鼓舞。他们的新君主亨利八世不仅如托马斯·莫尔描述的，“所有英国国王中，他是最博学的一个”，精通文学哲学和工程学，也有艺术造诣。而且，在一 些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还曾经是个俊美安详、幽默大度而又宽厚的年轻人。人们对他的印象曾经是有正义感，尊重学者，任用贤人，不但不傻，也绝不是个邪恶 的年轻人。

可是，大概就是应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规律，后来的亨利八世为所欲为、

任用奸臣，卷起了陷害大批忠良的黑色漩涡。身边环绕一批无信无义 之人，他自己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和没有安全感，编织“叛国”罪名滥杀，变成他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通道。所以，那些参与陷害托马斯·莫尔的人，后来也一样悉数 恶死于所谓“叛国罪”。亨利八世自己最后虚弱不堪，死于梅毒。英国一步步走过亨利八世时代，读来令人不胜唏嘘。君主最终也只是一个俗人，而绝对权力给了一 个君主得到一切，并且毁灭自己的能力。

所以，有人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在一个黑暗年代里，写着他的理想社会，期待光明。而他是个哲人，也就在《乌托邦》里，缜密地思辨着理想社会的现实可能。

《乌托邦》假借一个水手冒险故事，推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幸福海岛：乌托邦。家庭是乌托邦社会的基本结构，“妻子要顺从丈夫，子女要顺从父母”。 每三十家为一个单位，选举一个管理人，十个单位的管理人选出一个议员，组成国会。国会选出一生为王的君主。十六世纪的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就开始了宗 教自由的设想，但是，他的宗教自由世界里，并不容忍无神论者。在《乌托邦》中，透过英国早期的圈地，他已经在有预见地批判工业资本不加控制可能发生的弊 端。他认为这会“榨取穷人劳力”，“只对富人有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托马斯·莫尔，是现代思潮、也是马克思的源头。一些被以为是马克思发明的概 念，其实在这个幸福岛乌托邦里，已经可以找到。他的书中构想是：六小时工作制，工作要服从社会需要，唯有在业余时间，才是个人兴趣的天地。财产共有，没有 贫富差距。一起吃食堂，但是也容许开小灶。没有货币。偷盗抢劫也没有必要。法律很简要，不需要律师。物质极大的丰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后来我们读到 看到的社会主义实践、共产社会宣传，都已经很像了。《乌托邦》社会对律师业却很是鄙夷：“而且，他们（此理想社会的人民）完全废除了律师、代诉人和御用律 师……至于法律人，这群以操纵诉讼和增加纠纷为业的人，根

本不存在于这个国度。”

这样一个乌托邦想法并不需要很高的智慧，诉求明确，就是平等。莫尔在描述的时候，并不承认这全部是他自己认可的构想，反而还依据他所理解的人 性，在书中给乌托邦挑着毛病，他以第一人称，在书的对话中，挑战着那个水手描绘的乌托邦，挑战那里“物质极大丰富”的说法，他说：“在公有制下，人们不可 能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当人们感觉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却可以享用他人劳动成果，这样谁还愿意努力工作？”“大家都不努力工作，物质当然就不会丰富……那里不可能如此理想，因为人的本性良莠不齐，要在短时间就改善人性，绝无可能。”

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是用拉丁文写的《乌托邦》，他是写给自己的，大概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此后流传出去，被译成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在欧 洲各国出版风行，待转上一大圈，再回到英国，以英语面世，作者的头颅已经被砍掉十六年，就连砍了他脑袋的亨利八世，也已经死去好几年了，真是情何以堪。

乌托邦在十六世纪中叶就已经迷住了欧洲。它的虚拟虚构，也成了“不可能存在之好地方”的代名词。可是，不论人们怎样知道其虚幻，它虚拟的美好一 面，还是在不断提醒真实世界的悲惨和不完美。于是，《乌托邦》深深印入了社会改革者和学者们的头脑。这本书一次次被重印，一代代被阅读。到十九二十世纪， 通过不同人的变通修改，几乎成了世上海市蜃楼的指路灯。

（林达:美籍华人作家夫妇丁鸿富与李晓琳合用的笔名，著有《像自由一样美丽》、《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等。原文链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111270817_2.html）

【返回目录】



【反】

9-4 刘瑜：幸福的与被幸福的



“在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会选择什么呢？……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2503 年，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上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八个月大的婴儿放到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触电的婴儿在痛苦中痉挛、尖叫。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 200 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 Brave New World（《美好新世界》，或译《勇敢新世界》）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奥尔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 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 以及 Epsilon—— Alpha 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 Gamma 以下的人被限定得矮小愚钝。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这里如此富足，人们不愁吃穿，不再有疾病，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你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孟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 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做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 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苏联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毫无关系。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幸福。

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简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 如果说奥威尔的《1984》里，人们为失去自由痛苦，那么赫胥黎的《美好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和科学家给民众带 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自己去斗争？就像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 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出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对有些人来说，幸福，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

在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会选择什么呢？在幸福药丸 soma 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新世界”里的“野人”约翰选择了莎士比亚。

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院政治系副教授。原文链接：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0-03-28/110404816.html）

【返回目录】



9-5 南都周刊："反乌托邦科幻"（韩松）

"大部分写科幻的人都有一种悲观的东西，但他的骨子里面又有乐观的、非常希望乌托邦的东西存在于宇宙中间，人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他认为现实跟理想有很大的距离，他希望把这个世界毁灭掉，找一种方式再造一个出来。"

隐喻

利用日本技术制造的高铁列车，行驶中发生不明原因的重大事故。周原试图去探查真相，竟然发现列车为了躲避敌人的攻击而被改造为了一个人工宇宙……

这是韩松科幻新作《高铁》的起始情节。书中，韩松还把高铁比喻成一个不断膨胀的避孕套，这并非纯粹想象力的迸发。"一部分科学家对宇宙的描述，就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而且一定时候还要收缩。"在韩松的笔下，高铁就是一个巨大的膨胀的宇宙，它不仅在疾驰，也在自我膨胀。

这个隐喻是典型的韩松式的。高铁就是我们的社会，它一边高速发展，一边又在自我膨胀，最后控制不了自己，不知道将变成什么样的怪物。

《高铁》被看作是之前那本石破天惊的《地铁》的续篇。这次，韩松起笔就是一次残酷迅猛的高铁事故，死亡、混乱、挣扎、淫乱，阴暗的气氛弥漫着整部小说。这很容易让人猜测，韩松是否是对那次现实中的温州动车事故的一次影射？

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温州动车事故之前，《高铁》初稿已经完成。

韩松还记得那个“7·23”的晚上，他正在家改书稿，突然手机短信的提醒音响了：温州发生中国高铁史上空前惨烈的事件，伤亡数百人。回忆起那个时刻，韩松觉得自己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有点冷漠。“把高铁事故写完了，好像真的发生过了一样。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这为韩松的一句话做了注脚：科幻就是明天的新闻。

之所以如此说，跟他的职业有关系。现实中的韩松，是新华社的一位新闻从业者。很多作家躲在屋子里写科幻，靠的是想象力，但作为新闻人，韩松接触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现实事件，这种“不可思议”，就是他科幻的灵感来源。

美国《新闻周刊》描述说，韩松白天作为一名记者为新华社工作，晚上写作黑色而寓意深长的小说。

这种职业身份，让他与以《三体》蜚声文坛的刘慈欣有了明显的差别：刘以技术型的硬科幻和极度恢弘的想象力征服读者，而韩松，则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为他观察到的当代中国披上了一层科幻和荒诞的外衣。

这种科幻与现实的预言式交织，在韩松近来阅读的英国作家巴拉德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巴拉德在《沉没的世界》等几本科幻小说中，写到了生态环境的问题，他笔下的地球两极融化，海平面上升，城市沉没在水下。这几本书写于上世纪 60 年代，而那个时代，还几乎没人讨论过这种问题。到了今天，却成为我们生存恐慌的来源。

“我们晚了半个世纪才来补课。”韩松说，“科幻，就是提前跟你说什么事情可能会发生。”

做梦

韩松最早接触科幻小说，是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科幻是当时引进的西方文化思潮的一部分。“引进的都是西方最一流的科幻作家，也有很多后现代风格的作品，探讨的是当时西方最核心的问题，比如人和机器的关系，电视对人的奴役，消费文化今后怎么去控制人，人生活在真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等。”

读了这些作品，韩松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一股隐藏的热情被激发了，那种对超越性的星空与宇宙之秘密的好奇与热衷。于是，从 1987 年发表科幻处女作超短篇《第一句话》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宇宙墓碑》、《没有答案的航程》、《2066 之西行漫记》、《地铁》等，让他在科幻文坛独树一帜。

几十年后，他回头看看，发现自己所在的领域依然非常“边缘”。



在正式的文学体系中，科幻文学还是被列在儿童文学一类；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科幻专业，也是归在儿童文学专业里面。今年举行的科幻界最高奖项银河星云奖，也在惨淡经营。“像这样规模的奖项，没能找到赞助，都是会员自己掏钱。”

作为这一届评委会主席，让他欣慰的是参赛作品的质与量的提高。前两届入围的只有几十篇作品，今年一下就上升到两百多篇—评委们都看不过来。

在《三体》等重磅作品的影响下，这几年科幻文学的阅读群体在不断扩大，特别是 80 后群体。这个群体不再用儿童文学的眼光去看科幻小说，而是把科幻文学与城市、未来等这类比较“酷”的意味联系起来。

“我觉得，大部分看科幻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宇宙、未来是充满诱惑的极大空间，而不是为了逃避现实或者颓废空虚。”韩松说。

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崛起就会伴随着科幻的繁荣期。科幻最初发轫于英国，第一篇科幻小说就产生在工业革命期间，产生了当时最牛的科幻作家；然后就转移到美国，特别 1950 年代的美国出现了科幻的黄金时期;随之几个工业化的国家,比如苏联和 1970 年代的日本，也有一段黄金时期。到现在，西方国家的科幻热一直长盛不衰。

如果只考虑今天怎么活下去，明天怎么活下去，是没有梦的。“科幻把人的视野打开了，要让你去做梦。”韩松说，“我觉得中国也到了这么一个坎上，刘慈欣这些作家现在能够冒出来，是有社会背景的。”

悲观者

在小说《高铁》中，韩松给一个人物角色起名叫“吴未来”，这个名字的谐音背后弥漫着冷酷与悲观的意味。

几乎每本书，韩松都会遭到几家出版社的拒绝，不是因为担心销量，而是被认为“小说基调有问题”。

“技术时代的聊斋志异，电子囚笼中的卡夫卡”，这是出版方为韩松贴的一个标签。韩松的科幻被认为有强烈的“反乌托邦”的特征，这类作家往往认为社会达不到一个理想状态，人的自由都是被管制的，人要反抗它。

韩松承认，他确实受到了卡夫卡和《1984》的一些影响。“我觉得中国至少有一个东西还没有被写到，就是现在中国那种巨大的、超越了卡夫卡式的荒谬感。”

他喜欢看《聊斋志异》，解读那些通过隐喻描写的现实中不存在的故事。鬼在另一个世界，又来到了现实中，经历的故事也是隐喻和讽刺了现实。“它介绍了一种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想象，它认为鬼比人还好。”

既描写了虚构的荒唐的世界，又很真实，这是人鬼世界，也是科幻最本质的特点。韩松看来，科幻不过是在人鬼故事的基础上，加了些现代的科学技术，而不仅仅是美女与狐狸。

“大部分写科幻的人都有一种悲观的东西，但他的骨子里面又有乐观的、非常希望乌托邦的东西存在于宇宙中间，人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他认为现实跟理想有很大的距离，他希望把这个世界毁灭掉，找一种方式再造一个出来。”韩松说。

这就是韩松笔下的世界：支离破碎，又耀眼华丽，充满了机器的怒吼和人们的尖叫。哪怕是在最黑暗的世界，比如地铁里，你也会看见花花绿绿的疯狂广告。他的语言风格，也跟这个描述的世界一脉相承：各种夸张的比喻、支离破碎的描写、极端冲突的场景。

“如果有一辆去天堂的快车，但只要还有一个我关爱的人留在站台，我一定不会上去。并不是我有任何崇高，而是因为我和韩松在本质上都是悲观的，上车对我没有意义。”他的一位朋友张峥说。

恰好韩松下一本新书已经完稿，名字就叫《末日》。

（张小摩：《南都周刊》记者。韩松，科幻作家。原文链接：http://www.nbweekly.com/news/people/201211/31756.aspx）

【返回目录】

9-6 景凯旋：一切都未改变

“如果说权力就是魔鬼，以获取权力为目的的革命者，愿意为了乌托邦而放弃权力，还是愿意为了权力而放弃乌托邦？”



自十六世纪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1515）以来，产生了无数类似的文学作品。“乌托邦”意味着一个理性、平等和大公无私的社会，同时也意味着它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美好理想。到了二十世纪，当这个理想迫近实现时，创造观念的知识分子们却陷于恐惧，开始产生了许多反乌托邦的作品。

可以说，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思想构成了二十世纪的核心政治观念。尽管这两类作品都是虚构性质的，但就人类观念的实现而言，乌托邦作品是想象的、理想的，反乌托邦作品却是实践的、现实的。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的乌托邦理想得以实现的社会，在未来大概也看不到这个可能性，倒是反乌托邦在上个世纪得到了实证。

今天的读者大都熟悉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它们是札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我们》写于 1925 年，赫胥黎和奥威尔在写作前都曾读过这部小说。可以说，俄罗斯和东欧是产生反乌托邦作品最早的地区，那里的作家体验了无产阶级专政，最早预见到现代极权的威胁。

保加利亚诗人克里斯托·塞平斯基就是这样一位预言家。他生于 1898 年，卒于 1923 年，只活了 25 岁。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写下了一篇反乌托邦的寓言，时间上甚至还早于札米亚京。寓言的名字叫《阶梯》，讲的是一位年轻人看到民众的苦难，决心要彻底改变这种人类状况。

寓言的开头很有意思，采用的是西方哲学的终极追问：“你是谁？”但提问者却是魔鬼。年轻人回答说：“我生来就是一个平民，所有衣衫褴褛者都是我的兄弟！噢，这个世界是多么丑陋，人民是多么不幸！”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他必须先攀上阶梯的项端，而魔鬼却把守着阶梯，要想通过就必须行贿，交出自己的感官。

年轻人先是交出了听觉，魔鬼安慰他：“你仍然会听见！”果然，他听见阶梯下原来悲苦呻吟的人群，如今却在快乐地歌唱。接着他又交出了自己的眼睛，魔鬼安慰他：“你仍然能看见！”果然，他看见原来赤裸血污的人群，如今却穿着华丽的衣服，上面装饰着红玫瑰。到了最后一个阶梯，魔鬼提出的条件是交出他的心脏和记忆。尽管这意味着要拿走他的人的属性，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

现在，年轻人站在了顶端。他瞧着下方的人群，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那是光明、欢乐和满足的表情。他看见了下方人群的盛装集会，哀号声已经变成赞美的颂歌。魔鬼再一次微笑着问他：“你是谁？”年轻人回答说：“我生来就是一个王子，众神都是我的兄弟！噢，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人民是多么幸福！”人类的状况终于改变了。可事实上，一切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年轻人的地位和他看世界的立场。

十九世纪末，保加利亚就有了社会民主工党，其中的“紧密派”于 1919 年改名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主张采用苏维埃革命消灭剥削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在 1946 年执政后，许多过去的斗士觉得回报的时候到了，渴望着享受现代公寓、

乡间别墅和情妇。那个时期，离婚率直线上升，城市里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女性成为新权贵的抢手货。而在繁荣进步的口号下，这个国家却长期经济落后，大多数人的生活仍然不富裕。

塞平斯基的时代，整个“极端的年代”才刚刚开始，而他却预见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尤其他还是一位工人诗人，并被后来执政的保共视为共产主义者。他的肖像印在邮票上，许多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诗描写了下层的苦难：“在街灯的昏暗光线下/你在庆祝罪恶的节日/当你在夜晚发出笑声/无人能听见你笑声中的痛苦。”（《街头妓女》）如果他活得更长，看到 1946 年后保加利亚的现实，他又会写下什么样的诗歌？他还会被视为革命的同志吗？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这则寓言里，魔鬼就是权力的象征，它把守着通往乌托邦的道路，要想攀上社会顶层就得放弃人的属性。所有反面乌托邦作品都会描写一个理性的、机械的、无个性的世界，塞平斯基描写的则是乌托邦在人性上的不可能：同情心驱使革命者想要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则需要拥有权力，而权力必然会导致同情心的丧失。这则寓言令人想起奥威尔的《动物农庄》或吉拉斯的《新阶级》，他们都是曾经的革命者，揭示的是革命的被背叛；塞平斯基则不同，他揭示的是革命本身的悖论。如果说权力就是魔鬼，以获取权力为目的的革命者，愿意为了乌托邦而放弃权力，还是愿意为了权力而放弃乌托邦？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

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不平等，乌托邦的理想就不会消失，但人们对它的警惕也会不断加深，就像对权力的警惕一样。

刊于《财经》杂志，此为修订版。

（景凯旋：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原文链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111771221.html）

【返回目录】



【和】

9-7 江晓原：从小说到电影——乌托邦•反乌托邦不完全谱系



“如果我们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术语，可以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看成两个不同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而那些作品就是研究纲领所带来的成果。那么现在看来，‘乌托邦’纲领已经趋于退化（当然不是说它绝对没有生命力了），而‘反乌托邦’纲领则仍在进步中。‘反乌托邦’谱系的小说、漫画和电影，它们警示、唤醒、启发世人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它们还将保持很长时间的艺术生命力。”

所谓乌托邦思想，简单地说也许就是一句话——幻想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

用“乌托邦”来称呼这种思想，当然是因为 1516 年莫尔（Sir T. More）的著作《乌托邦》(Utopia)。但是实际上，在莫尔之前，这种思想早已存在，而且源远流长。例如，赫茨勒（J. O. Hertzler）在《乌托邦思想史》中，将这种思想传统最早追溯到公元前 8 世纪的先知，而他的乌托邦思想先驱名单中，还包括启示录者、耶稣的天国、柏拉 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修道士萨沃纳罗拉 15 世纪末在佛罗伦萨建立的神权统治等等。在这个名单上，也许还应该添上中国儒家典籍《礼记· 礼运》中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前莫尔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大致如此。

但是这个如此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最终却以莫尔的书《乌托邦》来命名，也有合理的原因——因为莫尔首次采用了文学虚构的手法，来表达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这种雅俗共赏的形式，使得这一思想传统得以走向大众。

自《乌托邦》问世以后，类似的著作层出不穷。如安德里亚（J. V. Andreae）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1619)，康帕内拉(T. Campanella)的《太阳城》(Civitas Solis，1623)，培根（F. Bacon）的《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1627)，哈林顿（J. Harrington）的《大洋国》(Oceana，1656)，维拉斯（D. Vairasse）的《塞瓦兰人的历史》(Histoire des Sevarambes，1677～1679)，卡贝（E. Cabet）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1840)，贝拉米(E.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莫里斯（W. Morris）的《梦见约翰・鲍尔》(A Dream of John Ball，1886）和《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等等。

当然，上面的名单远不是完整的，还有许多类似著作。

这些著作都使用了假想虚构的通信、纪梦等等文学手法，所以基本上都被视为小说。这些小说都旨在给出作者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设计。这些书里所描绘出的虚构 社会或未来社会，都非常美好，人民生活幸福，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类似于共产主义社会。这就直接过渡到我们所熟悉的“空想社会主义”了。事实上，上面这个名 单中的后面几部小说，就被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文献。

在回顾这一段历史脉络时，有一件事情令我稍感奇怪：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政治话语中，对“空想社会主义”当然是持欣赏态度的，尽管也会指出这些小说 中对未来社会的建构有种种“不足”，但是在中国至今未能产生出一部带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以至于我们中国人对乌托邦思想传统的贡献，始终只 能靠老祖宗留下的《礼记·礼运》中的那段话来充数。

到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情况完全改变了。

如果说 19 世纪儒勒·凡尔纳（J. Verne）的那些科幻小说，和他的西方同胞那些已经演化到“空想社会主义”阶段的乌托邦思想还有某种内在的相通之处的话，那么至迟到 19 世纪末，威尔斯 （H. G. Wells）的科幻小说已经开始了全新的道路——它们幻想中的未来世界，全都变成了暗淡无光的悲惨世界。甚至儒勒·凡尔纳到了后期，也出现了转变，被认为 “写作内容开始趋向阴暗”。

按理说这样一来，科幻作品这一路，就和乌托邦思想及“空想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以后两者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然而，当乌托邦思想及“空想社会主义”逐步式微，只剩下“理论研究价值”的时候，却冒出一个“反乌托邦”传统。“反乌托邦”向上可以与先前的乌托邦思想有形式上的衔接，向下可以表达当代一些普遍的恐惧和焦虑，横向还可以直接与社会现实挂钩。

而且，正是在这个“反乌托邦”传统中，幻想电影开始加入进来。

所谓“反乌托邦”传统，简单地说也就是一句话——忧虑一个不美好的未来世界。

1920 年，前苏联作家尤金·扎米亚京（E. zamiztin）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们》（We）。小说假想 了千年之后的“联众国”，高度专制极权，所有的人都只有代号没有姓名。主角 D-503 本来“纯洁”之至，衷心讴歌赞美服从这个社会，不料遇到绝世美女 I- 330，堕入爱河之后，人性苏醒，开始叛逆，却不知美女另有秘密计划……。作品在苏联被禁止出版，1924 年首次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结果扎米亚京被批判、 “封口”，后来流亡国外，客死巴黎。

1932 年，赫胥黎（A. Huxley）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营造了另一个“反乌托邦”。

在这个已经完成了全球化的新世界中，人类告别了“可耻的”胎生阶段，可以被批量克隆生产，生产时他们就被分成等级（用希腊字母表示）。每个人都从小被灌输必要的教条，比如“如今人人都快乐”、“进步就是美好”等等，以及对下层等级的鄙视。

在这个新世界里，即使是低等级的人，也是快乐的：“七个半小时和缓又不累人的劳动(经常是为高等级的人提供服务)，然后就有索麻口粮(一种类似于迷幻 药的东西)、游戏、无限制的性交和“感觉电影”(一种只有感官刺激、毫无思想内容的电影)，他夫复何求？”由于从小就被灌输了相应的教条和理念，低等级的 人对自身的处境毫无怨言，相反还相当满足——这就是“如今人人都快乐”的境界。这个新世界的箴言是：“共有、划一、安定”。所有稍具思想、稍具美感的作 品，比如莎士比亚戏剧，都在公众禁止阅读之列，理由是它们“太老了”、“过时了”。高等级的人方能享有阅读禁书的特权。

1948 年，乔治·奥威尔（G. Orwell）写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表达他对未来可能的专制社会（很大程度上以前苏联为蓝本）的恐惧和忧虑，成为“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经典。“反乌 托邦”三部曲中数此书名头最大。“一九八四”不过是他随手将写作时

的年份 1948 后两位数字颠倒而成，并无深意，但是真到了 1984 年，根据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的同名电影问世，为“反乌托邦”文艺之苑又添一部经典（奇怪的是《我们》和《美丽新世界》至今未见拍成电影）。

影片《一九八四》中的 1984 年虽在今天已成过去，但是在奥威尔创作小说时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奥威尔笔下 1984 年的社会“大洋国”，是一个物质上 贫困残破、精神上高度专制的世界。篡改历史是国家机构的日常任务，“大洋国”统治实际上是依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的。那个能够监视每个人的电视屏幕无处不 在，对每个人的所有指令，包括起床、早操、到何处工作等等，都从这个屏幕上发出。绝大部分时间里，电视屏幕上总在播报着两类节目：一类是关于“大洋国”工 农业生产形式如何喜人，各种产品如何不断增加其产量；另一类是“大洋国”中那些犯了“思想罪”的人物的长篇忏悔，他们不厌其烦地述说自己如何堕落，如何与 外部敌对势力暗中勾结等等。播放第二类节目时，经常集体收看，收看者们通常总是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振臂高呼口号，表达自己对坏人的无比愤慨——让人直接联 想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反乌托邦”小说谱系中，最新的重要作品应该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武德（M. Atwood）2003 年的小说《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 在这部小说的未来世界中，生物工程似乎成为唯一的科学技术。所有的疾病都已经可以被消灭，但是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 暗中传播。如果有人企图揭发这种阴谋，等待他的就是死亡--“秧鸡”的父亲就是因此被谋杀的。文学艺术已经遭到空前的鄙视，只有生物工程成为天之骄子。色 情网站和大麻毒品泛滥无边，中学生们把这种东西当作家常便饭。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处同时爆发，所有的人类在短短几天内死亡，人类文明突然之间陷于停顿、瘫痪。

影片《一九八四》可以视为电影加入“反乌托邦”谱系的一个标志。但是自此之前，

至少还有两部可以归入“反乌托邦”传统的影片值得注意，即 1976 年的《罗根逃亡》（Logan's Run）和 1981 年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罗根逃亡》名声不大，影片描绘了一个怪诞而专制的未来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质生活已经高度丰富，但人人到了一个固定的年龄（还在青年时代！）就必须死去。罗根和他的女友千辛万苦逃出了这个封闭的城市，才知道原来人可以活到老年。

《银翼杀手》则大名鼎鼎，在由英国《卫报》组织 60 名科学家评选出的“历史上十大优秀科幻影片”中名列首位。影片是根据 1968 年迪克（P. K. Dick）的科幻小说《机器人梦见电动羊了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改编的，讲述未来 2019 年阴郁黑暗的洛杉矶城中，人类派出的银翼杀手追杀反叛的“复制人”的故事。因为既有思想深度（如“复制人”的人权问题等），又有 动人情节（追杀、爱情等），而且充满隐喻、暗示和歧义，让人回味无穷，遂成为科幻电影中的经典。而影片令人印象深刻的阴郁的拍摄风格，几乎成为此后“反乌 托邦”电影作品共有的形式标签。

影片《一九八四》问世的次年，又出现一部非常奇怪的幻想电影《巴西》（*Brazil*，1985，中译名有《异想天开》等）。《巴 西》将它的讽刺集中在由极度技术主义和极度官僚主义紧密结合而成的政治怪胎身上。影片对极度官僚主义的讽刺当然容易理解，但它同时也强烈表现出对技术主义 的反讽。根据影片一上来对主人公山姆（一个良心未泯的小职员）早上从起床到上班这一小段时间活动的描写，观众就知道这是一个已经高度机械化、自动化了的社 会，可是，影片通过对场景和道具的精心安排，让人同时感觉到这些机械化、自动化又是极不可靠的，它们随时随地都在出毛病出故障。所以《巴西》中出现的几乎 所有场所都是破旧、肮脏、混乱不堪的，包括上流社会的活动场所也是如此——比如影片开头办公室天花板上那只虫子要命的虫子。

据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爆炸的那一天（1986 年 1 月 28 日），《巴西》的导演吉列姆（T. Gilliam）正在和人座谈这部影片，他表示我们如今依赖的技术系统越来越复杂和庞大，“出什么故障都是可能的”。他在影片中安排的种种情节和细节，比 如自动早餐中咖啡被灌到了面包上，山姆房间的空调故障之类，都意在对我们今天已经须臾不可或缺的技术体系进行反讽，以消解对这个体系可靠性的盲目信心。谁 知他座谈完一出门，发现人人面色凝重，原来是“挑战者号”爆炸了，这恰恰成了影片《巴西》反讽寓言的一个惊人脚注。

2002 年的影片《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假想未来社会中，臣民被要求不准有任何感情，也不准对任何艺术品产生 兴趣，为此需要每天服用一种特殊的药物。如果有谁胆敢一天不服用上述药物，家人必会向政府告密，而不服用药物者必遭严惩。然而偏偏有一位高级执法者，因为 被一位暗中反叛的妇女所感召，偷偷停止了服药，并且最终毅然挺身而出，杀死了极权统治者——几乎就是《一九八四》中始终不露面的“老大哥”。反抗成功虽然 暗示了一个可能光明的未来，而且影片因为有颇富舞蹈色彩的枪战和日式军刀对战，有时被当作一部动作片，但实际上影片所着力描绘的那个假想社会，充分反映了 西方人对此的忧虑和恐惧，因而使得这部影片在“反乌托邦”谱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

如果就广泛的意义而言，似乎大量幻想影片都可以归入“反乌托邦”传统。因为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幻想电影中，几乎从来没有光明乐观的未来世界，永远只是蛮荒——比如《未来水世界》（Water World）、黑暗——比如《撕裂的末日》、荒诞——比如《罗根的逃亡》、虚幻——比如《黑客帝国》（Matrix）、核灾难——比如《终结者》（Terminator，即《未来战士》）、大瘟疫——比如《12 猴子》（12 Monkeys）之类的世界。在这些幻想小说和电影中，未来世界大致有几种主题：一、资源耗竭，二、惊天浩劫，三、高度专

制，四、技术失控或滥用。

然而将概念过分泛化，对我们思考问题并无帮助，所以电影中的“反乌托邦”谱系，还是取狭义较好，即主要反映上述第三个主题的作品（往往也会牵涉到第四 主题，《巴西》就是显著的例子）。按照这样的标准，2006 年有两部影片应该可以归入这个精神谱系，即曾在中国公映的《V 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和稍晚些时候的《人类之子》（Children of Men）。

影片《人类之子》描写了一个阴暗，混乱，荒诞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已经全体丧失生育能力 18 年了！故事围绕着一个黑人少女的怀孕、逃亡和生 产而展开。随着男主人公保护这个少女逃亡的过程，影片将极权残暴的国家统治和无法无天的叛军之间的内战、源源不断涌入的非法移民和当局的严厉管制、环境极 度污染、民众艰难度日……等等末世光景渲染得淋漓尽致。

影片《V 字仇杀队》可以说是“反乌托邦”电影谱系中最正统、最标准的成员之一。这个故事最初是小说家的创作，1982 年开始在英国杂志上发表，随后由 漫画家与小说作者联手改编为漫画，最后由鼓捣出《黑客帝国》的电影奇才沃卓斯基兄弟将它搬上银幕（该片的编剧在《黑客帝国》之前就已完成）。影片旨在描绘 一个“严酷、凄凉、极权的未来”，并创造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英雄——V——来挑战这个黑暗社会。

在《V 字仇杀队》故事中的未来世界，法西斯主义竟获得了胜利，英国处在极权主义的残酷统治之下，没有言论自由，只有压迫和无穷无尽的谎言。V 这个反抗 极权统治的孤胆英雄，当然被当局视为恐怖份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这个永远戴着微笑面具的 V 神通广大，他搞“恐怖主义行动”可以炸毁大楼，搞宣传可以控 制电视台并播出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的演讲，文可以用他的艺术修养征服美女芳心，武可以三拳两脚将一

群作恶的警察打得满地找牙，一把飞刀更是出神入化……。最 后，V 煽动了一场群众革命：他挑选了一个具有历史象征性的日子——11 月 5 日（英国历史上天主教徒企图炸毁上议院，即所谓“火药阴谋事件”的日子），炸毁 了国会大厦，千千万万民众戴着与 V 一样的面具走上街头，熊熊火焰成为庆祝自由胜利的礼花，极权统治在在影片的高潮中轰然倒塌。这个结局，与影片《撕裂的末 日》中反叛的执法者斩杀“老大哥”的结局，在暗示的内容上异曲同工。而《V 字仇杀队》中那壮观夸张的盛大场面，则明显带着强烈的漫画风格。

从扎米亚京写出《我们》，至今已经快 90 年了，扎米亚京、赫胥黎、奥威尔他们所担忧的“反乌托邦”是否会出现呢？按照尼尔·波兹曼（N. Postman）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一书中的意见，有两种方法能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也许奥威尔的预言现在看来似乎威胁已经不大，但他认为“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实现”。

环境污染、资源耗竭、技术滥用、核战争、大瘟疫等等，都会带来黑暗的未来，这是幻想小说和电影中常见的。但是《美丽新世界》这样的作品，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的“反乌托邦”，如果文化一味低俗下去，发展到极致也可能带来一个黑暗的未来。

如果我们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术语，可以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看成两个不同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而那些作品就是研究纲领所带来的成果。那么现在看来，“乌托邦”纲领已经趋于退化（当然不是说它绝对没有生命力了），而“反乌托 邦”纲领则仍在进步中。“反乌托邦”谱系的小说、漫画和电影，它们警示、唤醒、启发世人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它们还将保持很长时间的艺术生命力。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师、博士生导师。原文链接：http://shc2000.sjtu.edu.cn/0705/congxiaos.htm）

【返回目录】



9-8 崔卫平：告别乌托邦——专访潘鸣啸

“现在你要作为‘个人’，重新和别人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和你们一样，曾经幻想伟大领袖马克思会给我一个理性，但是最后，要自己走一条路，有自己的理想。”



第一次见潘鸣啸先生，是在秦晖先生家，一个儒雅的法国学者，高个儿，神态睿智、宁静。他很快就让我觉得很生 气。第一，他将汉语说得那么好，“儿”音那么准确；第二，他的神情各方面都像中国人，他的谦和，他的内向，他带一些无奈的微笑，仿佛已经探到了我们民族的 根基，并从中生长了出来。他这样做，不仅让我对他的民族失掉神秘感，而且让我对自己的本民族失掉神秘感。

在同时失掉了对于两个民族的神秘感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对于老潘本人的神秘感，尤其是对于这本书的神秘感——《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 动·1968-1980》。该书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于今年 1 月份出版之后，很快加印了第二版。老潘告诉我，听说该书已经在盗版市场上出现。我回答他，有盗 版，您应该感到荣幸。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荣誉。

一个法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采访无 数人和阅毕无数书籍、文件、卷宗之后，写出了有关这场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迁移运动的研究专著——它的前因后果、各个阶段的不同特色，宏观叙事穿插着丰富的具体细节，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一份硕果。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画鬼容易画人难”。这本书中的绝大多数当事人还活在人间。让活着的人读到他们自己的历 史，面对自身的过去，这真是一个艰巨的考验。它是一

本严格规范的学术著作，也是一本可以当作故事书来读的历史著作。

带着这样那样的好奇心，我访问了潘鸣啸先生。

贫下中农不理解革命

问：你说你最早接触的一批知青是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那么你与中国的接触最早是在香港吗？

答：我 1968 年就开始学中文。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感兴趣，对中国哲学、文化也感兴趣。但是，我没有参加那些法国大学生的毛派组织，我一向都对个人崇拜觉得不对味，觉得个人崇拜是跟马克思主义有矛盾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文革”断了文化交流，所以只有一个方法，最便宜的飞机票到香港，那是最接近 中国的地方。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1971 年。一到香港就是林彪倒台，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训。起先香港的报纸上流传林彪有问题，可能死掉什么的。但是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法国人，都说这是谣言，结果证实这是真的。这让我觉得香港台湾那些报纸说的话不一定是错的。

到了香港我半工半读，一边教法语一边学汉语，我的进步很快，因为我选择的朋友都是讲普通话的人。我不想学粤语，我知道不可以同时学两门语言。几年以后我 偶尔通过一个朋友，碰到一批刚刚从广东省偷渡出来的知青，那个时候很多的。比较接近澳门和香港的地区已经没有一个知青了，他们差不多都偷渡出来了，偷渡了 几万，至少几万。虽然他们的工作很说辛苦，在香港做工人，但是他们还是比较关心国事，他们出了一个很小的民间刊物叫《黄河》。我和另外两个法国学中文的朋 友跟他们谈话，谈得非常有意思，觉得那就是另一个世界。当时中国很封闭。

问：什么样的故事那么吸引你？

答：首先我很同情他们，他们大部分都还是有理想的，当过红卫兵，跟工农兵相结合，他们在乡下继续讨论革命什么的。可是后来他们一到那边发现不可想象的落后，那么穷。他们说还有一些地区有抢婚的习惯，我想中国还是这样的时代，真的是没想到。

问：你没来之前，觉得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

答：我们受宣传的影响，比方说我们在大学只能看《红旗》杂志这样的刊物，我们都相信以前的中国穷、不平等，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平等了，不一定说是 很好的日子，可是差不多没有太穷的人。可是他们（指偷渡的知青）跟我们讲的是，中国还是那么落后。他们说要我们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可是你跟那些农民谈话， 他们根本不理解什么是革命，他们仅仅为了吃饭就从早到晚拼了命。为了自己的利益，农民还经常会做一些损害公共财产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很受刺激，怎么能做 那样的事情呢？后来我们完全理解了，因为人们的生活那么苦，这是本能的一种反映。那我觉得这个有意思，我觉得我就是从他们得到了同样的一种经历，从完全乌托邦的一种理想，就面对了历史，到面对了现实。

我也要当“一小撮”

问：这样一件浩瀚如烟的工作，耗费了你许多年的时间精力，是什么动力让你坚持下去？

答：“六八情结”。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全球化，全世界的青年是有一种共同的兴趣的。我们那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对社会公平，对人类的命运什么的 都积极关心。在中学的时候我要放弃学习跑到印度，还好我的父母把我的护照扣下来，没有让我走。后来跟越南战争也有关系。法国的学生反对美国人征战越南什么 的。这个运动



开始是几百个人游行示威，他们不是共产党（指法共）控制，完全是比较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也是很浓的，这些人有幽默感。我们有一种本能的正 义感，也要去。而且，当时有个部长说，“有一小撮极端分子闹事”什么的，我觉得这也很有幽默感，我也要当“一小撮”。

问：你当时是大学生了吗？参加后做了什么？

答：当时我是大学生，二年级，学哲学的。5 月 10 号之后，索邦大学关门了。一些人开始用一些铁的东西，把石头路上的石头挖出来，当作路障。那个时候我就 有一点反对，我觉得我们是应该非暴力的。可是那个时候非暴力是不行的，警察冲来了，在那种情况下你就要选择是不是扔石头了。而且那天警察用催泪弹，比较厉 害，有人把车烧掉了，那个晚上我一辈子都记得的。当然比起中国那么多事情还是不算厉害，可是在法国还是算得上一种风暴嘛。从那以后我就天天参加，我跟当时 我的女朋友我们去参加占领当时一个国家比较有名的剧院。我们要占领一些法国的大学、文化机构什么的。

问：占领以后怎么办呢？

答：法国政府还好，如果他们完全跟我们抵抗的话，那就会有死人的事。还好，他们只是砸那个门。因为是法国国家的剧院，有那个法国国旗的，我就让我女朋友 站在我肩上，我们把法国国旗拿下来，把蓝和白撕掉，只留下红的。你看我有多么“红”！以后我们在里面，整天开会，讨论，我们要跟工人阶级结合什么的，算是 占领区吧。有些人就到大工厂去做宣传，雷诺汽车厂什么的，后来整个法国都罢工了，13 号有一个非常大的示威。是一百万人参加，非常伟大。本来那些非常大的 工会，法共，都不太赞成我们这么做，后来他们觉得因为有这种力量，从下面的力量，就一定要参加，不然他们就要被抛弃，然后他们就参加了。很快，就没有石油 了，没有车了，我就骑自行车，那时我们很开心的，觉得巴黎已经是解放区了，没有警察。警察不敢出面的。

问：“革命”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答：革命就是把戴高乐赶走。一旦把他赶走，然后搞一些苏维埃，搞一些真正的民主、直接民主，我们也是对那个巴黎公社很感兴趣。后来和中国红卫兵谈，我们都有共同的目的。要搞一个巴黎公社，而我们就在巴黎。

政治上不成功，但在社会方面变化非常大

问：结果是怎么收场的？

答：后来戴高乐就失踪了，他坐直升机到了德国，得到了军队的支持。他马上说把议会解散了，然后在全国选举，可是他说他本人不会退。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 怎么办。很多人说选举就是骗人，但我们没法把整个百姓的思想都统一起来，很多农村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结果选举的时候还是大部分人选了戴高乐。我们就 觉得完蛋了，还好我们没有像德国、意大利那样搞了很多恐怖主义的活动。后来我就离开了，去香港了，有一些人就继续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还有一些毛派，他 们完全是放弃了学习，去工厂，农村工作。

问：算是失败吗？

答：还好，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完全失败，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大的变化，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上，变化非常大。

问：什么样的变化？

答：比如教育。我也参加了与教育部长的谈判，说我们不要考试什么的。教育制度改了很多，特别是大学，活跃了很多，大学课程、科目也有许多选择。一二年级 不用考试，老师给你做一个评价就好。还有，男女关系，事实上 1968 年开始的时候是男女

关系的问题，不是政治上的问题。当时有男女宿舍，男生不准许进女生 宿舍，我们就觉得不能接受，接着就有闹事的，男生占领了女生宿舍。我们不但要政治解放还要性解放。

问：这个当然很有名。还有呢？

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妇女堕胎，那个时候是非法的。我一个好朋友的妻子怀孕了，因为保守的天主教的力量，就不可以堕胎，他们只能去找一个非法的医生，很痛苦的。这在 1974 年之后就完全改了。还有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从那之后，就松了，自由了。所以我觉得 1968 年影响很大，对法国来说，打开了一些 局面，在社会方面。

因为这个，我反省

问：考虑过你们为什么失败吗？

答：我们没有完全失败，只是在政治上失败了。我们只能失败，因为我们的理想是马克思主义，当时已经过时了。我不是说马克思的东西完全都过时了。只是现在 看来，他的主义过时了。比如他说的阶级，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斗争是存在的东西，但你要以为阶级斗争是历史上唯一起决定作用的东西，那你就是疯子。在这方 面，我们也成熟了。后来我们也反省了。觉得这种斯大林制度是不行的，是没得救了，还是宁愿有戴高乐也不愿意有斯大林。后来看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 岛》，我们知道了这个制度那么恶劣，觉得这个路是不能走的，要找另一条路，虽然我们不要右派的路，但左派的路我们是要自由的。所以后来就我们这一代中的很 多人，就往民主社会主义上发展了。

问：您本人呢？

答：1979 年 2 月我到北京。我天天去看民主墙，后来就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感兴趣了。我觉得反正是同一代，他们是当过知青的，现在就当民主运动的分子了。我 觉得

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开始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后来就离心了，完全开始追寻民主法制，民主法制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和这一代人同路，完全平行，跟 这一代有很多共同语言。你看现在我不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我觉得中国的知青也是这样的，从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变得面对现实。我现在的要求不是那么 大，我知道理想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可是至少有一些进步。

问：无论如何，民主法制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现实的框架，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需要追寻、有待实现的东西。

答：因为这个，我反省。在西方有的东西我们看不起，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在没有这些东西的国家，那就是一种苦难。我们还是应该懂得它的宝贵。真正 的民主不可能陈旧，真正的民主会随时变的。没有最后最高的一个纲领，它是随时被人民选择、讨论的。民主就是一个框子，由我们往里面放东西。但至少要有这种 框架的民主，有这种原则。每隔几年就投票，那些有权势的人不可以没有顾虑的。心里怎么坏都不能表现得太坏，他还是有顾虑的。

有人会觉得我说这话是反动的

问：开始承认自己也有好东西了，而不是永远将眼光投向别处？

答：我觉得法国的民主还是不够，还是有权贵来欺压人。但是回想我们法国的历史，我觉得还是幸运的。我们住在一个有法国启蒙、有法国革命的地方。革命有时 有暴力血腥什么的不好，但革命也有好的。我记得我跟朱学勤谈，他就不喜欢革命。我说，这个不是老百姓可以选择的，如果一个贵族他欺压老百姓，那老百姓不革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英国贵族他聪明，他自己改自己。但法国贵族太笨，保守，那个时候不革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革命以后至少普及了一个概念，就是平 等，公民的人权。

问：这个平等是需要制度来保证它实施的。

答：包括选举，包括人权、法制的保护。没有了这个我觉得不可能是平等的。平等应该包括没有一个人能控制另外一个人。这个不是工资的问题。在当时，毛泽东 的工资也不是很高的，但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你可以说他和老百姓是平等的吗？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大的缺点，就是只看经济不看政治。后来我才了解了这个问题。

问：在你看来，假如没有人权的保证，就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答：对。后来我看了一些美国的汉学家的书，我觉得他们根本不懂中国。他们用美国的思维方式来了解中国，比如他们研究得很详细，来研究中国上世纪 70 年代的工资，非常详细，然后他们说，中国还是非常平等的。这个对我来说是笑话。

问：为什么？

答：因为当时的不平等不体现在工资的问题。那个时候你有权力什么都有。如果你是一个“黑五类”的孩子，和一个高干子弟、军官的子弟之间，差距那么大，你 还可以说是平等吗？他们不能用一个社会的规则来了解另一个社会的规则。当然，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你的工资收入是衡量是否平等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中国这个 地方，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年代，你去买东西、住房子甚至都不需要花钱。钱在这个社会根本不重要，权才是最重要的。

问：有说林彪至死也不认识人民币，他不需要钱，不需要用钱。

答：对！你不懂这个就不能了解中国。我现在也看到中国有些人把毛泽东时代理想化、美化。这是因为中国现在这个问题两极分化严重，有人要往后看，说过去多 么好。但那个时代的不平等不是在钱的问题上，而是在权的问题上。有些人没有权，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事实上，知识青年也是这样的 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那么你就一点活路都没有。你就根本不知道到死你是不是

能回城。

我们在西方虽然穷人不比富人有很多路，可是还有选择，还有自己的办法。我的父亲是小学老师，按理还是不富，就是工作了几个月我就买得起机票，我就可以跑到 很远的地方学中文。可是他们（知青）跟我讲的是他们根本不自由，根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知道怎么就被送到中国最远的地方，最后怎么才能回城。没有 办法有的就讨好那些干部，有些女知青没有办法，就只有陪那些干部睡啊，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根本不自由。

所以，如果你要解决现在中国的问题，根本不要往后看。我在法国也有一些中国学生，因为年轻他们都不大了解中国。我以为他们应该懂得，他们其实根本不懂。他们向我学习一些中国历史的基本的常识。

青年人要有自己的理想

问：那么你怎样帮助从中国出去的学生，了解中国的大致框架？

答：我自己不喜欢宣传，也不喜欢反宣传，我只能尽量客观地讲，但客观的讲是需要很多资料的，而且你要将这些资料拼起来，才能比较接近真理。为什么我的书 能在中国出，因为我完全不是做正面还是负面的宣传，我只是写我知道的客观的东西。在我看来，我的书出了以后，一些中国读者跟我说你的书有很多注释，几乎每 一句都有很多注释，而这些注释基本上都是官方资料，我觉得应该这样。应该让那些年轻人了解这些情况，至少不要用那个时代的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

问：那个时候的理想是要加引号的，是一个不由自主的理想，也不能因为那个加引号的理想没有了，永远就没有理想了。现在应该找到你的自主性。



答：你不需要一个伟大领袖给你一个理想。而且现在也根本不可能了，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已经完全个人化了。你个人可能有一种怀念那个时代，团结在一 起，可是那个时代的团结完全是人为的，铁板一块的，不自愿的。现在你要作为“个人”，重新和别人团结起来。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和你们一样，曾经幻想伟大 领袖马克思会给我一个理性，但是最后，要自己走一条路，有自己的理想。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潘鸣啸：法国汉学家。

原文链接：http://www.eeo.com.cn/observer/grls/2010/08/26/179199.shtml）

【返回目录】

9-9 盛韵：杜赞奇谈中国传统中的“普世精神”

“历史上，大一统中国的统治阶级一直试图垄断与‘天’的交流，但没有成功。‘天’成了个体与群体的自我修养和道德生活的精神资源，它能够为自我的发展提供一整套计划，而且可以在自我和超越之间提供链接，能够达到一种普世的定位，不仅可以容纳杰出的人们，也可以为更广泛的社会目的服务。”

当中国沉醉于“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之中时，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教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霸权，而是更公正的世界愿景。近代的普世主义从康德起一直延续到马克思，曾是理 念、原则和伦理的源泉，但这种思想资源后来逐渐让位给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从古代东方思想的历史资源中寻找普世伦理和超越精神，也许能够为今天的个体如何 与其所生存的环境相联接提供一些借鉴。

问：在这个时代的语境里，“普世精神”被泛政治化了，但普世精神应当不仅仅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概念吧，比如说我们可以诉诸中国传统？

杜赞奇：有些人可能会完全拒斥历史上的普世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历史是断裂的并且是有差异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严肃对待普世主义，因为这代表着理念和原 则的源头。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在它缺席的情况下运转。现代世界之所以濒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危机，就是因为现代普世主义从西方的特定环境下产生，却没有很 好地解决问题。

那为什么现在还要讲普世主义？在我看来，民族国家的格局和整个世界之间越来越不协调，所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 种世界观念的支撑。民族国家的体系发



展到一定阶段，会产生国际联盟组织，以便共同处理超越国家的问题。可是我一直说，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联合国无法达到它 的理想，因为民族国家为了在全球竞争中维护自身的主权利益，总是会系统化地推卸自己对世界的责任。而民族国家为了在这种竞争性的世界秩序中生存，必然会发 展出一套非常强的自我 / 他人对立的政治身份（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例子，所有人都要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乌托邦，从政治 上和经济上战胜敌人而奋斗。

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大潮改变了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之间的格局。利益相近的国家开始结盟，新自由主义使得国家将 公共资源逐渐私有化，这一切令民族国家和全球性之间本来就不协调的关系更加剧烈了。本来应该负责长期发展项目的国家和地方管理机构受新自由经济目标的左 右，开始追逐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全球性的环境恶化，这已经无法靠一国一地的政策去解决。生态不稳定会影响水源 和农作物，这些问题是无国界的，为了表述并处理这些问题，民族国家不光要与他国合作，而且必须与区域性和全球性组织分享主权。

在我看来，中国必须对这种根源性的失调状况有所回应，并从历史传统中或是新型普世主义概念下发展一种世界性的理念。我在这里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个词，指的是所有人类都属于某个社群。这种归属感能够与其他身份认同的社群分享（如地区、国家或宗教），一个世界性 的社群必须能够与相近的其他社群分享主权。换句话说，一个世界性社群的机构或代表必须能够在政治社会的某些领域中做出关涉主权问题的决策。

问：不少中国学者提出传统的“天下”体系很有世界性。

杜赞奇：中国的“天下”理念可能是存活到十九世纪末的最后一种古代世界的普世主义。历史上大部分帝国文化都有来自超越体——要么是上帝，要么是一种非人 化的



创造，比如“天”——授权的普世理念，这样才有正当性。在这些传统中，超越体成为普世伦理的认识论权威，所以伦理能够让社会更好地组织运作，并且能够 对人民提出自我牺牲的要求。

中国学者里最积极地提倡将“天下”体系作为新型全球秩序的是赵汀阳。他在一篇论文中叙述了天下观产生于公元 前一千年的商周过渡期。周作为一个权力有限的政权，却成功管理了一个疆土大得多的帝国，因为它以一种世界眼光来管理，将天下政治置于地方之上。赵汀阳还认 为，天下模式在当代的拓展应包括：一个世界政府控制更大疆域的领土和军队，其附属国应承认世界政府以获得合法性，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在其他大部分事务上保 持自治。文化帝国不是基于强力和自利，而是使用礼制作为手段来限制自我及其利益。天下是一种等级制的世界观，秩序高于自由，精英治理高于民主，政治机构有 高低之分。

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批评了赵的观点，他认为从赵使用的《老子》、《庄子》等文本中无法推导出 自上而下的治乱方式。老庄所讲的“乱”，代表着一种“去中心化的多元秩序”，不是那种要求上方发令的混乱。此外，王铭铭还指出，天下观不能以一种方式去理 解，应区分秦统一前后的两种变体。的确在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天下”失去了“和而不同”的特质，而变成了帝国规则。赵汀阳在后来的文章里承认秦以后的 “天下”理想被扭曲了，但他依然认为天下体系的核心在于自上而下的政令。我觉得这很成问题，如果单靠礼仪秩序本身就能让政治领导施行仁义，那为什么我们还 要假设一种高度理想化的人的概念，以及学习修辞呢？退一步说，就算礼仪制度在周朝运转良好，我们还需要考虑宗族关系等其他控制资源、平衡权力的复杂因素。

如果说要将天下体系这种古代体系搬到当下，就更怪异了。如果政治体系不是基于民主选举，我们不知道谁会代表世界政府及其掌管的巨大资源。正因如此，卡拉汉怀疑

这种普世主义形式所代表的不是后霸权时代的理念，而是一种新霸权。

问：那么您觉得古代中国中的哪些思想资源具有真正的普世性？

杜赞奇："天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概念，我觉得它不是特别有用，因为这不过是另一种谈论帝国的方式。我觉得更有用的概念是"天"，"天"的概念更有 包容的潜力，它本身的定位就是超越性的，并且嵌入了伦理理想。伦理生活在中国社会无疑是一种意义深远、极为重要的理想，这不光是对潜在的圣王而言。历史 上，大一统中国的统治阶级一直试图垄断与"天"的交流，但没有成功。"天"成了个体与群体的自我修养和道德生活的精神资源，它能够为自我的发展提供一整套 计划，而且可以在自我和超越之间提供链接，能够达到一种普世的定位，不仅可以容纳杰出的人们，也可以为更广泛的社会目的服务。当然儒家也讲社会目的，而道 教、佛教更是拓宽了社会的范畴，它们也关怀动物、自然等等。

当"天下"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时，"天"和"道"继续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独有的观念，你看康有为、章太炎那一代的学者，他们就有非常强的普世观念。

问：您觉得现代人还能理解并接受"天"这样的古代哲学概念吗？

杜赞奇：我不是要人们接受古代哲学的概念，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古代哲学所运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说被现代化时代给毁掉了。近代与自我相关 联的是民族国家，而现在民族国家也淡化了，现在成了市场。所以我们也应该寻找新的思想体系，比如可持续发展，或其他具有全球性、普适性的体系，使得自我可 以与之关联。

我对"天下"观有很多批评，就是因为你不能把古代的政治观念很僵化地套用到当下的现实。我对中国传统概念的运用和中国新左派对传统概念的运用有很明确的不同之

处，我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不是“天下”观之类的制度化的表达，因为它无法应用于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已经改变太多。我觉得 依然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不仅是历史上的观念，也是中国人如何将自我与世界相连接。这种连接虽然被民族主义者一度破坏，但我们还是应该找办法与其他普世精神相关联，而且这些精神应与我们的时代特征相符。

问：您曾经提到现代普世主义的一大问题是缺乏超越性。但我们的确身处在世俗年代，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那样。

杜赞奇：我的确认为现代的普世观缺乏超越性。但我也认为我们可以有一种超越性的世俗，我正在写一本书，就是讲世俗世界的超越性。不然的话，我们如何去理解许多人愿意牺牲生命去奋斗的事业呢？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牺牲了很多个人生活，就是因为他们脑海里有更高的目标。我觉得，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也 正在成为一种超越的理想。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最后的超越性理想，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更高的目标而牺牲自我，这更像一种殉道精神。当然这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问：说到超越性，您觉得宗教思想资源是否能有帮助？有时候宗教信仰更容易让人走向极端……

杜赞奇：从某种程度上说，亚伯拉罕诸教（指世界主要的三种有共同源头的一神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因为这三种宗教均给予圣经旧约中的亚伯拉罕 崇高的地位，且均发源于西亚沙漠地区，来源于闪米特人的原始宗教——编按）这方面更糟糕些，而非亚伯拉罕宗教则没有那么强的我们 / 他们的分野。亚伯拉 罕宗教倾向于认为，你不归顺我，就是反对我。这样的信仰是很难讲道理沟通的，所以我通常在非亚伯拉罕传统尤其是东方传统中寻找超越性的资源。

问：一方面我们在寻找可行的普世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似乎在走向分裂，极端主义越来越多，共识越来越难以形成……

杜赞奇：任何时候都没有人会要求一个完全统一的世界，但是的确存在一些普世性的目标，是人们所渴求的。这正是我们叫做超越性的东西。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许多带有超越性色彩的团体出现，有些是半政府性质的，有些是非政府组织。中国也有许多类似的群体，尤其在大连、云南等地，种类也丰富各异。它们都不是单一的孤立的体系，而且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共享管理程度。我的想法不是简单地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把它们变成一个大联合国或是什么世界政府，我觉得在各国应该有不同程度的民间组织，并共享一种理念，这些理念不必是系统的意识形态化的观念，但应有明确的目标。这类组织在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尤其重要。我还认为这些目标应该有超越性的一面，这样才能激励人们去努力。

有一本书叫《摩擦：全球关系的民族志》（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很有意思，是一个华裔美国人类学者罗安清（Anna Tsing）写的，讲印度尼西亚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如何团结起来拯救森林，与那些企图毁掉森林的跨国企业斗争。他们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组织协作，所以必须得有一种共同的理想；而另一方面，要使共同理想得以实施，其方法必须是能够普及的。

问：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历史上的普世精神能为现代普世主义提供怎样的借鉴？

杜赞奇：首先，需要重申强调的是，整体性批发古代秩序或原则是不可接受的，是反历史的。古代思想能为我们当下的状况提供借镜的，是实质性的目标及其达成的方式，比如应该如何重塑自我和自然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其次，我们能够从韦伯所谓的“东方智性宗教”中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中华帝国时期对于自我和超越之间的反省式连接的历史方法。在东方传统中，较少依赖信仰，而较多依靠冥想、伦理熏化或瑜伽养生等实践。



现代普世主义对超越性或是乌托邦 真理的投入不是特别自信。这种犹豫是很有道理的，看看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的例子就知道了，纳粹借助神圣化的情感宣泄和仇恨高于理智的美学获得了疯狂的权 力。所以我并不宣扬宗教性的超越精神。但是没有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能够不靠象征物和情感力量来完成，所以，超越权威的各种形式最需要分析的首要问题就是神 圣和理性的互动。哈贝马斯和保罗・利科对此都有论述，当然他们主要分析的是亚伯拉罕诸教的传统。

我们在讨论“天”和“道”时，会发现连 接神圣权威和理性目的的其他方式。不论是对一个家庭主妇还是一个儒家圣人来说，“天”都是人类伦理使命的源泉和最高评判者。但“天”又不是像上帝那样的拟 人化存在，不会给你现世报。谭苏宏认为儒家思想中“天”的功能很模糊，而且时常自相矛盾。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探讨“天”的模糊无为的性质，同时也应该探索 自我修养的技巧和实践在保持“天”的伦理权威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天意”在帝制时期常被控制，但中国缺乏权威的神职人员对“天意”进行明确解释，所以给 各个时代留下了相当大的阐释空间，使得我们的时代可以对之进行更为理性的阐释。到了民国时期，就连“三纲”也得到了相对有弹性的阐释。这种允许人们自我授 权的弹性空间正加强了“天”的象征力量。如果“天”在民国时期仍能够发挥作用，在今天又有何不可呢？不管怎样，当代的普世运动总可以从中华帝国晚期的天授 人权的方法论中获得一些启发。

(盛韵:《东方早报》记者。杜赞奇:历史学家、汉学家，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原文链接：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2-05/06/content_617107.htm)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本周官员新闻

一份据称为**山东**一官员写给某女子的承诺书在网上流传，该承诺书写道：“我单增德承诺，自今天开始一个月之内与张凤云离婚。离婚后与苏春媛结婚，特此承诺。单增德，2012 年 11 月 21 日。” 30 日山东省纪委称离婚承诺书一事经初步核查情况属实，已经立案调查。

新闻：http://fmn.cc/Tv89Yc

http://fmn.cc/SxuhC4

11 月 23 日，自称**黑龙江省双城市**女记者“王德春”，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孙德江，称受孙德江要挟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还举报孙德江存在以权谋私，把公家资产变相专卖等行为。当事人最终选择接受媒体采访，她称，“不论结果怎样我都输了”。

新闻：http://fmn.cc/11Df3j3

http://fmn.cc/SxughF

广东省纪检监察网消息，据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同志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梁道行今年已 63 岁，是深圳本地人，毕生在深圳工作。2009 年因年龄原因请辞副市长后，还担任了 2011 年深圳大运会执行局局长职务。

新闻：http://fmn.cc/Sxud5v



连日来**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接受调查，直到 6 日中纪委证实此事属实，据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李春城此番被调查，或与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晓明案有关。戴晓明为李春城“得力干将”之一，被纪检部门调查期间检举揭发了他人多条违纪违规线索。

新闻：http://fmn.cc/SxsqNG

http://fmn.cc/SxsCMT

连日来中国的“网络反腐”已经导致了多名官员落马，媒体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财经》杂志的编辑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存在伪造学历、与商人结成官商同盟、威胁情人等问题。不过在还没有经过组织调查的情况下，能源局当日下午否认了对刘铁男的举报。

新闻：http://fmn.cc/SOXngj

据新华社旗下的《财经国家周刊》12 月 6 日报道，**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宋建国因涉嫌违纪，正在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报道称宋建国因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在购车摇号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行为。不过这一被调查的理由遭到北京警方的否认。

新闻：http://fmn.cc/VxM9RR

对于十八大后的网络反腐热茶，新华网评论称，“反腐不应只靠情妇”，文章引述中纪委的数据“95%的问题官员有‘二奶’或者情妇。”认为“部分官员的贪欲、色欲总是压倒理智，党性挂在嘴上，女性放在心里”。

新闻：http://fmn.cc/11DhnGI



监督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5 日公布了 2012 年全球腐败指数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 80 位，对比去年的 75 位，略有下降，而近来中国的新领导人多次表示要狠抓腐败问题。

新闻：http://fmn.cc/RBesg0

本周法治新闻

在纪念宪法颁布 30 周年的活动上，习近平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他还称，“让民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正义”

新闻：http://fmn.cc/SxuepT

11 月 30 日上午，沂南县法院在没有通知亲属和律师的情况下，对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被控故意伤害罪一案进行突审，并当庭宣判，陈克贵被控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他则称不上诉。而在该案处理过程中，沂南县当局存在多处不合法之处。

新闻：http://fmn.cc/V8kAIH

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今年 2 月 27 日开始被上海非法监视居住，期间数十名警察和国保人员轮班监视，直到本月 20 日软禁结束，共计 268 天。恢复自由后，冯正虎到上海检察院二分院控告上海警察对其的非法禁锢。

新闻：http://fmn.cc/X6uUXN

11 月 29 日，备受关注的**吴英**“案中案”有了结果，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撤销于 2006 年 12 月 28 日达成的民事调解书，并以毕健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得到本色集团委托授权为由，驳回毕健以本色集团的名义的起诉。



新闻：http://fmn.cc/TuL6wH

据北京青年报的消息，近日，**北京**朝阳法院判决河南长葛市 10 名截访人员非法拘禁罪成立，10 名截访人员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刑，主犯被判 1 年半，其余 9 人则分别被判处几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不过当天下午朝阳法院就否认了这一新闻，据悉审理的是一起“黑监狱”案而非河南截访案件，但此事引发了热烈讨论却没有停歇。

新闻：http://fmn.cc/S0Za1x

http://fmn.cc/S0ZaB0

第二天，媒体指出，朝阳法院开审的是**北京**今年 5 月破获的“黑监狱”案，非河南长葛截访案，而且这并非首例截访人员被判刑案件，此前北京已经查办多起截访非法拘禁案。

新闻：http://fmn.cc/11DeJ3F

http://fmn.cc/11DeRQR

对于为何**北京**截访事件频发却鲜有人员受到法律制裁一事，当事访民谈及此事认为，不可能没有幕后主使。而他们在“黑监狱”内所遭遇的非人虐待也令人震惊。

新闻：http://fmn.cc/Sxu2Ho

引关注海南莺歌海抗议建造电厂事件而广为人知的“海南环保斗士”**刘福堂**被控非法经营罪一案，海口市龙华区法院 12 月 5 日宣判：著书批评破坏生态环境并自费印制广泛赠阅的刘福堂，被判决犯非法经营罪，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并处罚金 1.7 万元。而刘福堂在失去自由 168 天后终于在 5 日晚得以回家。

新闻：http://fmn.cc/VxWQ6P

台湾反传媒垄断

台湾学生组织“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29 日在公平会门口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旺中并购壹传媒而出现的媒体垄断。联盟指出，旺中集团并《苹果日报》后，其日报市占率将达 46%，认为旺中并购壹传媒后，是实质媒体垄断，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伤害。

新闻：http://fmn.cc/SP0pkJ

而由壹传媒并购案引发的风波仍在继续，12 月 3 日，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成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学生陈为廷在立法院批评教育部长“伪善”、“说谎”，随后《联合报》用 2 大版批评学生、清华大学发表亦致歉声明，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发声明号召记者响应反垄断运动。

新闻：http://fmn.cc/SP0pB3

壹传媒并购案之后，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这将改变台湾媒体的现有格局，**台湾**媒体势力图或出现亲大陆的变化。而此番出资收购壹传媒的蔡衍明以亲大陆的态度而闻名，他在收购《中国时报》后采取亲大陆路线，导致一些心怀不满的记者辞职。

新闻：http://fmn.cc/V7jUTX

本周新疆相关新闻

连日来的强降雪天气，导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河谷区域多地出现灾情，积雪最深达 40 厘米以上，，截至 2 日 13 时，伊犁河谷共有 11524 人受灾、1 人受轻伤，因灾死亡（转场途中摔伤致死）牲畜 164 头（只），8160 头（只）牲畜面临饲草供应困难。

新闻：http://fmn.cc/Sxu2ac



本周网络最热话题除了反腐当属“切糕”，这一切都源于 12 月 3 日上午，**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官方微博发布的一条有关维吾尔族人和当地村民冲突的消息，其中写道新疆籍商贩损失了 16 万的切糕，引发民众哗然，随后一系列关于切糕、公正、民族的话题在网络上蔓延。

新闻：http://fmn.cc/SP1by0

沉默两日后，**湖南岳阳**通过新华社，两度澄清这一事件中的一些细节，并向公众道歉。据悉新疆籍商贩共损失 16 车、重 5520 斤的切糕，加上 16 台三轮摩托车和人员医疗、遣返费用，共计 15.2 万余元，这些费用由平江县人民政府先行垫付。

新闻：http://fmn.cc/VlEznl

http://fmn.cc/VlEvE1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上周一，**新加坡**的上百名中国籍司机因不满薪资不公而停止工作，目前罢工已经结束，但有 5 名司机被新加坡警方指控煽动罢工而被捕。此外，其中一名中国籍巴士司机包锋善（38 岁）被判坐牢 6 个星期。

新闻：http://fmn.cc/Ywcjou

http://fmn.cc/Tv76Hy

http://fmn.cc/Tv7eqF

http://fmn.cc/UB3zuy

11 月 30 日**郑州**一座立交桥下有一名农民工因病死亡，知情者表示他已经在此躺了 20 多天，期间 120 急救车曾来过但没有带走他。这名农民工的名字和住所都不为人所知。

新闻：http://fmn.cc/SxtZva



11 月 27 日上午，京沈客运专线（以下简称京沈高铁）规划**北京**路段两侧的小区居民代表前往国家信访办，提交了关于调整京沈高铁选址的联名请愿书，质疑其环评结果，表达沿线 17 个小区居民要求京沈高铁远离家门口的诉求。截至 11 月 28 日下午，至少数千人参与了签名请愿。

新闻：http://fmn.cc/TpK18H

近期有媒体报道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前主任张维庆的说法，称政府在起草放开二胎计划，“拟议的修改将允许城市夫妇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而**国家计生委**相关人士则回应称“放开二胎”言论无参考价值。

新闻：http://fmn.cc/SroJdB

在**天津**站广场，有人专门诱拐智力异于常人的人，并将他们送至天津一家洗车行做黑工，这些人常被殴打得遍体鳞伤，还被禁止出门，近日警方查获了这家洗车行。

新闻：http://fmn.cc/11Dh4vt

12 月 1 日晚，由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盛世欢歌”中国中老年文艺汇演活动在**人民大会堂**展演时，多个演出团体指责主办方未兑现承诺，数千老人被忽悠，据悉文化部已介入处理此事件。

新闻：http://fmn.cc/TCnB6W

12 月 2 日，一条**原阳县**一教师长期威逼强奸一女生，猥亵另外至少 3 名未满 14 周岁的女生，还导致一名女生怀孕并堕胎，原阳县教育局有人对家长嘲讽称，如果在漫天野地被强奸，是不是要去追究漫天野地的责任？不过该局监察室主任刘军对媒体否认曾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新闻：http://fmn.cc/TEhn4p

http://fmn.cc/YsZ8pD

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 13:30 左右，中国援建的**柬埔寨**菩萨省斯登达岱水电站大坝一号出沙孔突然发生泄漏事故，10 人被洪水冲走，经过抢救，遇险人员全部脱险，其中 3 人受伤。事故的原因是由于大坝蓄水位高，致使水压过大而产生突然泄漏。据悉，目前，该工程已经暂时停工，接受检查。

新闻：http://fmn.cc/11nZlJt

12 月 2 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称，**武汉** 1.3 万余新爱丽舍出租车，却是被强制以高价购买、无 ABS、刹车盘小于正常尺寸的“缩水版”车，刹车制动存在隐患，且已运行一年多，严重威胁城市交通安全。

新闻：http://fmn.cc/SxtP6Y

目前在美国纽约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 10 日世界人权日来临前发表了一篇讲话，通过视频对中国人权现状进行抨击，呼吁习近平切实政改，并鼓励民众坚持维权。

新闻：http://fmn.cc/UB6dAv

据**汕头**当地媒体报道，早上九点许，一架空军小型直升机坠毁在汕头市区的护堤路赤窖路段，导致该路段交通堵塞。照片还显示事故引发了火灾并导致人员受伤。国防部网站晚些时候证实，“广州军区空军某部组织飞行训练时，一架歼 7 飞机在起飞上升过程中突发机械故障，飞机状态无法控制，坠落在广东省汕头市郊区，地面 4 名受伤人员第一时间被送到医院救治。”

新闻：http://fmn.cc/SP1SY5

http://fmn.cc/SxsPQq



据广东媒体的消息，12 月 4 日下午**汕头**潮南区陈店镇新溪西乡政府附近一家文胸作坊突发大火，已经导致 14 人死亡 1 人重伤。犯罪嫌疑人刘某供认，因 500 元劳资纠纷，买了 40 元汽油到该厂放火后逃跑，据悉在 14 条年轻生命中，有一位女工已怀有身孕。

新闻：http://fmn.cc/Sxta5E/

http://fmn.cc/SxohJG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路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目前已举办二十余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卢思骋、贺卫方、胡泳、黄耀明、秦晖、欧宁、潘毅、许宝强、叶荫聪、于建嵘、张铁志、周保松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路。今年 7 月，Co-China 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两岸四地大学生夏令营，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点击这里申请。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姚梧雨童 夏景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陈楚君

技术支持：毛向辉、冯自强

出品人：杜婷

